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伟人之初 领袖篇

朱德



## 丛书献词

我们在近现代中国悲壮而撼人的历史画卷前肃立、沉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个名字不停地闪烁，一条条对理想苦苦追求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如果有人问：谁的理想最宏远，谁的追求最理性，谁在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解放道路上洒下了最多的热情与鲜血？历史已经昭示，那就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这一代震古烁今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常想：同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他们能走出封建中国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抛弃旧我，完善新我？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精神，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他们能脱颖而出，成为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成为我们这个悠久、灿烂而又一度落伍的古老民族的脊梁？

我们企望沿着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所留下的履迹寻求答案。

我们努力地求索。

我们坚信，这中间蕴含着一个不屈民族永恒的内力。

我们还坚信，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灿烂与辉煌，依旧需要这种永恒的力量。

《伟人之初》丛书，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记录和结果。如果青年朋友们在与这些也曾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伟人们的心灵对话中有所启迪的话，那末，这就是对我们这种努力和追求的最大鼓励。

《伟人之初》丛书编委会

## 一 大巴山的儿子

## 家世

四川北部的边沿，横亘着绵延不断的大巴山脉，犹如天然的屏障，阻隔了巴蜀古国与外界的联系。唐代诗人李白曾为此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在大巴山西麓的重山叠峦之中，隐没着一座很少为人知晓的县城——仪陇。这里就是朱德的家乡。

据史书记载，仪陇县城初置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 502 年），因城址设在大仪山顶部的平地上，故以山势而得名“仪陇”。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 620 年）在仪陇设方州，将州、县治所迁至金城山上。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又将城址移至金城山腰，沿金城山天险为城，一直延续至今日。

距县城东南 74 华里处，有一座形似马鞍的大山，人称马鞍山。旧时，每逢一、五、八日，附近乡民都来此山前平坝上赶集（又称赶场），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里为“马鞍场”。这里群山拱卫，松柏成荫，翠竹掩映，人们曾经将许许多多梦幻般的传说赋予这片景色秀丽的土地，企望它能带来幸福与欢乐。然而，在那风雨飘摇的漫长年代里，残酷的现实留给穷人的只是贫困与痛苦。

1886 年 12 月 1 日（农历十一月六日），刺骨的寒风挟着鹅毛般的雪花无情地袭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马鞍场李家湾一户贫苦农民的家中，一个幼小的生命呱呱落地，来到这苦难的人世间。他，就是朱德。朱家的辈份是按照二十八字的韵文排列的：“发福万海从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技术耀前章”。朱德是“代”字辈，所以，家中为他起名“代珍”。入塾后，先生又为他取字“玉阶”。以后从军时才改名朱德。

朱家迁至仪陇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据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记载，朱家“籍起粤东，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在四川历史上，素有“湖广填四川”<sup>1</sup>之说。自元末明初始，由于连年战事纷坛，致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大片的土地荒芜。因此，明洪武年间即开始向四川移民。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战乱再次给四川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实行移民政策，采用各种方式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大批农民迁入四川。朱家就是在这场大移民运动中，从广东韶关来到四川的。以后逐渐由川东移向川北，自先祖朱文先迁至仪陇马鞍场始，到朱德这一辈已是第 6 代了。

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世同堂，十几口人居住在地主丁邱川废弃的一座破仓屋里。全家人吃饭穿衣仅靠着佃租地主的几十亩薄田维持，生活十分艰难。

朱德的祖父朱邦俊，是一个淳朴、勤劳的农民，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黄土地，直至“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

祖母潘氏，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劳动妇女，主持着家中一切事务。在朱德的印象中，朱家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在祖母的管理下，一家的开支、活计安排得井然有序。

朱邦俊有 4 个儿子：世连、世林、世和、世禄。世林便是朱德的父亲，

<sup>1</sup>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2 页。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 页。

他继承了父辈的秉性。但是，由于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朱世林逐渐养成了暴躁的性情，致使朱德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很惧怕自己的生父。

朱德的母亲姓钟，是穷苦艺人的女儿，她性情温顺，为人贤惠。虽然不识字，却明达事理。

在朱德的记忆中，伯父朱世连留给他的印象很深。也许是由于他从两岁起就过继给伯父承嗣，成为长房长孙的缘故，从此，他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家中一贫如洗，但是，千百年来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在这个佃农家庭里也毫无例外地保持着。几十年后，他在谈及伯父时，认为伯父治家严谨、颇有心计、勤于劳作、知慳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男人。

朱德出生时，已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姐姐秋香 15 岁时就出嫁了。大哥代历比他大 4 岁，二哥代凤比他大两岁。

朱德的家庭，如同旧中国千百万穷苦的农民家庭一样，为了生存，在贫困的苦海中拚命挣扎着。从朱德诞生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承受着苦难的煎熬。

## 母亲

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人是自己的生母。母亲把伟大人格：忍耐、宽厚、善良融入朱德的血肉之躯，对朱德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母亲生于 1858 年，祖上是漂泊四方的艺人，母亲的父辈在仪陇定居后，仍然保持着钟家的传统，靠卖艺为生。遇到有人家婚娶、丧葬、生日，她家就被主人雇去吹吹打打；遇到过节赶集，便搭台演戏，以此勉强糊口。在朱德的记忆中，“那是一帮爽朗而愉快的人，一般老百姓对他们喜爱得不得了。”

虽然这类艺人是百姓们不可或缺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且生活也没有保障。

钟氏生育朱德时，才 28 岁，却已是 4 个孩子的母亲了。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的生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显露出苍老、憔悴。额头上、眼角边的皱纹记录着这位农村劳动妇女的沧桑岁月。朱德后来在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起他的母亲时说道：“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听说，我临出生的时候，母亲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我就呱呱落地了。母亲生了我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

在旧时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农民，而农民中最苦的又要数农妇。她们除了劳动、生儿育女，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这种封建的传统观念在朱家也毫无例外地保留着。孩子越多，母亲就越苦，钟氏生了朱德以后，又生了 9 个儿女，因为实在无力抚养，被迫溺死了 5 个。这在钟氏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随着弟弟的降生，朱德就失去了吃奶的资格。而且由于母亲的大半时间被家务和农活占去了，没有更多的精力照料这些苦命的孩子。幼年的朱德便离开了母亲的抚爱，在土里滚、泥里爬，在大自然的沐浴下，他竟然没有得过什么病，相反的却磨练出一副健壮的体魄。

为了抚养众多的孩子，钟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白天在地里干活，种田、种菜、挑粪，回到家里要挑水、做饭、喂猪、养蚕，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一直到深夜。由于钟氏的勤劳、聪慧，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她做饭时，用菜籽油放在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里做调料，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钟氏亲手纺出的线，请人织成布，染上颜色。这种“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老二、老三接着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氏就是这样终日忙碌着。

在朱德的记忆中，母亲性情和蔼，从没有打骂过孩子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在朱德稍懂事时，经常和哥哥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在“吱扭扭、吱扭扭”的纺车声中，听母亲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每当母亲讲到穷苦人怎样受苦时，孩子们的眼睛里时常充满了泪花；每当母亲讲到有钱人为富不仁、欺负穷人时，孩子们又恨得攥紧小拳头。听着听着，孩子们困乏了，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抱回漆黑的小屋，纺车又继续“吱扭扭、吱扭扭”地响了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6 页。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4—15 页。

起来。

朱德四五岁时，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活计。也许是由于他从两岁起就过继给伯父而成为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的缘故，也许是由于他比其他几个兄弟更为听话的缘故，在几个兄弟中间，母亲更疼爱他，干活时常常把他带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德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不少劳动的知识。他后来回忆说：“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地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钟氏心地善良，她自己虽然生活很苦，还周济和照顾其他穷苦的乡亲。谁家断了炊，谁家的婆娘生了病，她总是带着朱德去安慰一番，送去一点粮食糊口。有一年，南巴地区闹了灾，不少灾民外出逃荒。他们经过村子时，挨户乞讨。钟氏拿不出可以救济的粮食，就煮一锅瓜菜糊糊，让朱德送去。朱德从小耳濡目染，受着母亲的影响，他也常常帮助年迈体弱的老人割草喂牛，帮助力气小的伙伴把柴草背回家。

在朱德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1895年除夕朱家被迫分家时的情景。他永远也不会忘却他的母亲留给他的教诲，母亲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也更加高大。“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以她勤劳俭朴的习性、宽厚仁慈的性格和朴素的阶级意识，为中国革命造就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而朱德一直怀念着给予他完美人格的母亲。1944年，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母亲在家乡逝世，享年86岁。消息传到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号召，做母亲的要学习钟太夫人，做儿女的要学习朱德总司令。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此时，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然而他很快将这种哀情埋入心底，生化成一股力量。他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111页。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114页。

活。”



## 老织匠的故事

朱家的房后，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大路，它是古时驿道的一条支路。这条大路，可以通达仪陇县城，它给儿时的朱德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大路上过往的行人中，有背着器械的匠人，有走江湖的艺人，有运送货物的商人，也有身穿长衫的读书人，还有乘坐肩舆、轿子的地主、官吏等。朱德时常蹲在路边的山坡上，好奇地观察着从眼前经过的各式各样的行人。有时，过往的行人也在朱家房前的树荫下歇脚喝水。从这些人的谈话中，朱德知道大山外面有仪陇县城，有成都、重庆、西安和皇帝驾座金銮的北京城，还有比四川更大的中国国土。他也听说洋鬼子一再打败中国军队，朝廷腐败无能，却对老百姓实施暴虐。这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外界产生了兴趣。他后来回忆说：“我时常在‘大路’上跟着人走，直到人家赶我回去”，“我希望到外面走走。”

在过往的匠人中，有一位令朱德神往和钦佩的老织匠。每年入冬以后，他都要来朱家。母亲和婶婶们把一年里纺出来的线交给老织匠，织成布，再拿去染上颜色。这样，全家人的穿盖就都有了。

老织匠也是广东客家人，这时已年过六旬，早年曾参加太平军，跟着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他的到来，总是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他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牢牢吸引着孩子们。

朱德7岁那年，一入冬，他有空就跑到大路边，翘首眺望着大路的尽头，期待着老织匠的出现。

老织匠终于来了，还带来一个十余岁的小徒弟。老织匠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背也弯了许多。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拉着老织匠的手把他迎进家门。从此，朱德每天一放学，把分配给他的家务做完，就和兄弟们挤在织机旁，请求老织匠摆一段龙门阵。每次都是大人们来催促好几遍，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一天，老织匠给孩子们讲起了太平军的故事。他一面熟练地摆弄着织机上的梭子，一面述说起来：

“四五十年前，中国和外国打仗打败了，洋鬼子闯进了中国，朝廷怕得要命，洋鬼子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下子可苦了老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穷人被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拿起家什和官府拚命。

“那阵子，闹起了太平军，穷人们都跟着天王洪秀全打官府的军队。天王手下有许多智勇双全的将领，像石达开、李秀成、李开芳、林凤祥……官军见了他们的旗子，吓得就跑。太平军杀贪官、杀财主，把粮食和土地分给穷人……”

老织匠眉飞色舞地说着，又兴奋地唱了起来：

日头出山亮又明，  
乡里来了太平军。  
财主恶霸挨捆绑，  
推去杀头民欢心。

……

孩子们听着，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朱德的心目中，太平军的将士们不怕

官府，不怕朝廷，不惜用自己的性命为穷苦人打天下，都是英雄好汉。

“织布爷爷，您也是太平军吗？”朱德好奇地问。

“是啊，”老织匠笑着说，“我跟着翼王石达开从西打到东，从东打到西，闹得可红火了！”

“后来呢？”朱德迫不及待地追问着。

“后来，”老织匠的神色顿时暗淡下来，他充满深情地说道：“官军人太多了，我们打了败仗，退到大渡河边。可是，官军又紧紧追了上来，一场血战，打得真惨呢！河里漂满了尸体，水都被血给染红了。后来，我装扮成山民才侥幸跑了出来，四处漂泊……。”

老织匠放下手中的梭子，伤心地流下眼泪。

“织布爷爷，石达开死了吗？”朱德拭去眼眶里的泪水，又问道。

“他是不会死的。听说不久前有人还看见他头戴银盔，身披银甲，骑着一匹大白马，身子骨可硬朗了，还像当年那样威武。”

朱德也不愿意相信石达开已经死了，他多么希望石达开再拉起一支队伍，为穷人报仇，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

布织完了，老织匠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朱德和兄弟们把老织匠送上大路，他盼望老织匠再来时，能带来太平天国英雄们的好消息。

来年冬天，老织匠没有再来，以后朱德也再没有见到老织匠。然而，太平军将士的英雄业绩，却深深打动了他那幼小的心灵。直到几十年后，朱德仍然对老织匠所讲的故事记忆犹新。他曾不无感触地说过：“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故事给我很大影响。”

## 仇恨的种子

朱德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亲眼看到，全家人一年四季从春天忙到冬天，起早贪黑，用汗水换来的稻谷，却一担一担地送到地主的粮仓里。地主上山避暑或是进城看戏，也要朱家出人抬滑竿。为什么粮食要给地主送去？为什么一家人成年累月的劳动，到头来却缺衣少食、不得温饱？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衣服？为什么穷人就要受地主的欺负？他对此百思不解。然而，仇恨的种子却深深埋在他的心底，成为他日后立志救国救民的思想动力。

1892年，6岁的朱德跟着哥哥代历、代凤走进了离家不远的药埔垭私塾。

为什么要送孩子们上学呢？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本来是没有钱送孩子们去读书的。但是，多少年来，朱家受尽了地主、官吏的盘剥欺压，而在当时，地主、官吏对读书人却有几分尊重和惧怕。于是，读书便成了农民生死攸关的事情，一家人宁愿倾其所有或者借债，也希望自己家中能培养出个读书人，不论是支撑门户，还是帮助家里记帐、打算盘，都是有益的。朱家长辈们经过商议，决定把准备赎回大湾旧屋的费用用来为孩子们支付学费。

对于当时的情景，朱德后来依然记忆犹新：

“入学那天，天还没亮，全家便都起身了，看着上学的孩子洗好脸穿好整齐的衣服，又谆谆告诫说，要绝对服从先生，不许有二话——因为师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吃过早饭，老大、老二、老三随着大伯父像执行神圣任务一样，出了家门。全家老小一直送到门口……”。

私塾的先生叫朱世勤，是朱德家的远房亲戚，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字。教授的课程自然是从《三字经》开始，而后再念《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教材。从清晨到中午，日复一日，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一直念到每个字都记住为止。

朱家三兄弟刚到私塾时，原有的10多名学生都是富家子弟，在他们眼中，穷人家的子弟是不配来读书的。朱家三兄弟在讥笑、嘲讽中度过了几个星期，终于无法忍受，在代历的带头下，把富家子弟打得鸡飞狗跳。然而，受到惩罚的不是那些富家子弟，而是朱家三兄弟，回到家中，他们又遭到父亲的训斥和鞭打。

1893年，朱德和大哥代历又转到丁姓地主（朱德把他称作“丁阎王”）的家塾里读书，因为那里的先生是个秀才，颇有些学问。朱德的伯父答应丁家分担聘请先生的费用，这样，他们才被允许进入丁家私塾读书。然而，他们的学费没有少缴一文，却只能听半天课。为了让孩子们读书，朱家也只好接受这些苛刻条件。

在丁家私塾，朱德兄弟坐在课堂里光线最暗的地方，周围的同学都是丁姓地主家的子弟。他们从不认真读书，还经常欺负来自农家的朱德兄弟。在这种倍受屈辱的环境中，朱家兄弟唯一的信念是，家里花那么多钱送他们来读书，他们也要为家人争口气。

这一年冬天，山里只下过一场小雪，田里的墒情不好。到了春天，仍然没有摆脱旱情，许多土地都裂开了口子。朱家老小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往田里车水，朱德放学后也来到田里帮忙，一直干到深夜。

旱灾严重地威胁着山区的农民，许多农家因为田里的禾苗枯死，不得不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初夏的一天，正在家中的朱德忽然听到远外传来嘈杂的喊声，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近。继而，一阵阵急促的锣鼓声从丁家传来，朱德知道这是地主丁阎王在召唤他的佃农去保护他家的院子。可是，朱家的大人们谁也没有动，他们坐在堂屋里，默默地等待着……脚步声、呼唤声形成一股巨大的声流，震撼着狭小的山坝，也震撼着朱德的心灵。“吃大户罗！吃大户罗！”那愤怒、悲枪的呼号，久久地回荡在山坝里。

第二天，朱德看到数百名骑马的官兵从大路驰过，“喝—喝—”的吼叫声，令人闻而生畏。几天后，朱德才听到来他家投宿的人讲，成百上千的灾民，一路呼喊着，遇到地主家的大宅院就冲进去，打开粮仓，拖出猪羊，大吃一顿，而后，又顺着大路漫无目标地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官府派去的士兵终于追上了饥饿的灾民，顿时，尸横遍野、哭声震天，成百的灾民惨死在官兵的铁蹄之下。这一幕幕悲惨的景象一直没有从朱德的记忆中消失，直到40多岁以后，他还能清楚地讲述起当时发生的一切。

由于灾荒，朱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一天只能吃上两餐，吃的是野菜、树叶，加一点高粱米。夏末秋初，一场甘霖给乡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朱家日夜赶种庄稼、瓜菜，总算熬过了饥馑的一年。

但是，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地主丁阎王趁着荒年要提高佃租，这如同雪上加霜，朱家怎么受得了呢？农历除夕的晚上，富人家的孩子们提着灯笼、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们却围坐在长辈的身旁，默默地听着大人们议论来年的生计。谁想到，丁阎王的管家竟在这时闯进家门，强令他们立即退佃、搬家。抽田，对于佃农来讲，无疑是断绝了生路。全家人计议良久，决定由朱世林夫妇带着子女迁居陈家湾，朱德随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迁回大湾，在朱家老屋附近佃租土地。

分别的时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热泪，依依惜别了慈爱的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别了他生活九年的山村。朱德后来回忆起当年家庭破产、骨肉分离的惨景时说：“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

## 蒙师的启迪

朱德随伯父母移居大湾的1年以后，具有远见的伯父又送朱德进入距大湾7里地的席家偏私塾继续读书。他在这里度过了9年的私塾生活。

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字聘三，号伯谷。朱德入塾时，他已年近50。席先生年轻时，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也就打消了科考的念头，在家设馆教书，兼种几亩土地，聊以为生。

席先生为人刚正，嫉恶如仇。在朱德的眼中，席先生不仅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9年间，席先生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意识和图谋变法革新的维新思想对朱德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德曾把他称作是自己思想上的启蒙老师。

朱德在席先生门下读书的几年间，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一方面，清王朝统治者腐朽昏庸，致使国力日蹙，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软弱无能，束手无策，在列强的铁蹄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饱含屈辱的条约，使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日益觉醒，不堪忍受民族的屈辱，奋起抗争。一些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疾呼，纷纷提出救国治世的“良方”，企图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社会的动荡同样震撼着西南偏隅的山村。席先生经常把他听到的悲惨事实讲给学生们听，启发大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少年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下，知道了许多大山以外发生的事情，明白了许多道理，萌发出要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意识。

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致使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次年4月，在日本的淫威下，清王朝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并且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从此，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被瓜分危机。

割地赔款的消息一年以后才传到马鞍场。席先生在课堂上气愤地对学生们说：“如此下去，我们偌大的民族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肥肉，任凭洋人宰割。朝廷的赔款，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搜刮去的，苛捐杂税就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穷人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啊！”在席先生的言谈话语中，他特别称颂那些敢于反抗官府、反抗洋人的英雄好汉。席先生爱憎分明的态度，在朱德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掀起了国民救亡图存的浪潮。上海《申报》的评论道：“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台湾同胞更抱定“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决心。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正在北京应考的康有为听到签订条约的消息，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了“万言书”，联络十八省千余名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呈送光绪皇帝。这就是当时震撼朝野的“公车上书”。书中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要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其中变法

---

载 1895 年 7 月 15 日《申报》。

《中日战争》第一册，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03 页。

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万言书”中还初步提出了变法的具体主张。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各地相继组织学会、开设讲馆和创办报刊，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改良派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变法。从此，新政诏书、谕令不断传往各地，这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黑暗年代，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席先生想方设法把变法诏令的内容抄录下来，向学生们反复诵读、讲解。朱德把先生的话记在脑子里，回到家中，便津津乐道地向家人宣传变法维新运动。对此，茫然无知的家人，虽然弄不清朱德讲的事情有什么实际意义，他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不再受到地主和官府的压榨，但是，他们却为朱德能知道那么多的天下大事感到骄傲。

然而，短命的维新运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烟消云散。消息传来，席家私塾里也充满了忧愤的气氛，席先生激动地向学生们介绍谭嗣同等人舍生取义的悲壮事迹，勉励学生们将来要立志救国。

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摆脱外国列强的欺侮？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德在席先生追求科学进步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思考起寻找救国道路的问题。席先生虽然痛恨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虽然他自己也没有学过西洋科学，但是，他从“科学使西方国家成为强国”这一事实出发，告诫学生们，要使自己的民族强盛起来，不再受人凌辱，就要学习西洋科学，美国、德国、日本之所以能够强盛，就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有一年夏季，朱德的学友吴绍伯从成都度夏归来，带回一本北京译学馆出版的数学书，引起了席先生的浓厚兴趣。他把吴绍伯、朱德找来，加上自己的儿子，4个人接连琢磨了几个晚上，在昏暗的烛光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尽管这时的朱德并未理解先进科学技术的真正含义，仅仅是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但是，他说：“对科学的信仰从此而起，我也成了热心的信徒之一。”

在席先生的私塾里，朱德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涉猎了一部分史籍，以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一些历史小说。然而，对他来讲，更主要的收获还不仅仅是打下了旧学的基础，而是看到了在大山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他日夜思索着走出这片狭小偏僻的山乡，去寻找新的生活。

## 二 向往

## 参加科举考试

1905年，在家中长辈的催促下，19岁的朱德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自戊戌维新以后，国内政局发生着巨大的震荡，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一系列事变之后，执掌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为了讨得帝国主义列强的信任，也不得不“力行实政”，其中对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改以策论代替，并诏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又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往国外留学，学成后，将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的头衔。这种“变法”，丝毫没有触动科举制度的地位，它仍然是读书人走入仕途的必经之路。

作为佃农的朱家，尽管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十多年来，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养朱德念书，就是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读书人，将来经过科举，可以做官，走上仕途，摆脱贫困的生活。然而这时的朱德，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想去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他之所以去参加科举考试，原因有三：一是席先生赞同他去试一试，尽管席先生自己对科举考试十分厌恶；二是拗不过家中长辈的意志，他对长辈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期望有着深切的体味；三是想由此实现自己多年来“到外面去看看”的愿望，在席先生的开导下，他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启程那天，朱德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都赶来为他送行，全家老小聚集在大路上，仿佛在进行着一次隆重的仪式。朱德静静地聆听着长辈们的一再叮咛，他仿佛感到自己肩上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承负着朱家的命运与寄托。同时，他也为自己将要步入一个比马鞍场更广阔的世界而感到欣慰。

掌灯时分，朱德和吴绍伯、席景荣等七八个同学走进了仪陇县城，他们在城关找到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城东的县署礼部验身。报名时，他改用“朱建德”的名字。而后，他们又一同去逛街。

县城的街道已年久失修，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扭曲着向前延伸。街市上倒很热闹，沿街店铺挑出的破旧幌子，五花八门；小贩们坐在路旁高声吆喝着，箩筐里装着青菜、豆腐、猪肉、鸡鸭等等；空场上还有几个艺人在耍把戏，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的声音。初次进城，朱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不时地仁步，总想看个仔细。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城西的圆通阁。这里盛行佛教、道教，因此，建造了不少寺、庙、庵、祠、观、阁，历史上最多时达到百余座。其中最大的要数古刹西龛寺，此寺建于后周，院内建有圆通阁。战乱时，寺院被焚，仅留下圆通阁。朱德和同伴们进了阁门，拾级而上，来到顶层。朱德凭栏眺望，远处群山叠翠，一览无余，近处房屋依山而建，鳞次栉比。他从未见过这般景象。然而，他更想知道，在群山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县城的几场考试很快就过去了，对于朱德来说，似乎感到很轻松。

当朱德打点行装和同伴们穿过街市时，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讨吃”（即乞丐）跪在路旁向过往的行人乞讨。朱德路过时，那个“讨吃”伸出手向他行乞，他注视着这个“讨吃”，发现那人竟是当年老织匠所带的小徒弟。他连忙向那人打听老织匠的下落。原来，自从老织匠离开马鞍场后，就去了川东，没想到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后来，总算是保住了性命，



可是，再也不能织布了。没几年，川东义和团起事，杀洋人、烧教堂，老织匠叫小徒弟参加了义和团。不幸的是，义和团的活动很快被官府镇压下去，小徒弟也被抓去砍了双脚。放出后什么也干不成了，师徒二人只能靠乞讨为生。不久，老织匠就死了。朱德听着，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4 月间，朱德又与几位同学结伴赶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

顺庆，是仪陇等 8 县的府治所在地，地处嘉陵江西岸，是川北地区水陆交通和经济的中心，距离仪陇县城 300 多华里。朱德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如此开阔的世界，一切是那样陌生，又是那样新鲜。当木船在宽阔的嘉陵江上行进时，他仍在忐忑不安地回想着“嘉陵江在山上头”的离奇的传言。

在顺庆期间，他听说这里的新式学堂是由从国外留洋回来的人办的，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式的，他对此产生了极强烈的兴趣。

返回仪陇后，他和同伴们又抽空去盐井参观，他听说那里有西洋机器。然而，呈现在朱德面前的并没有什么新式机器，而是许多面黄肌瘦、身躯佝偻的盐工。他们赤裸着上身，艰难的推着巨大的木制绞盘。更使朱德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几时曾在一同玩耍的伙伴，那人已经被肺病折磨得不成样子。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试中榜的消息便传到马鞍场，朱家老小欢喜异常。他的伯父告诉家人，等到省试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可以去做官，那时，朱家光耀门楣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这时的朱德却和家人想的不一樣，他经过这次远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渴求新学的朱德。

考期逐渐临近，家人也忙着为朱德收拾行装。没料到，这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 年）始，废止一切岁、科考，科举制度既已废止，省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消息，对于朱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多少年来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而朱德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趁机告诉家人，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考试。诏令中提到入学皆由学堂出身，去上新式学堂，将来同样有所作为。在他的解释下，家人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他去顺庆读书。

这一年秋天，在家中长辈的主持下，朱德和一位刘姓农家姑娘（刘氏，仪陇县人，婚后一直在家务农，1958 年 2 月病逝）结婚。

## 寒门学子

1906年，朱德来到顺庆，先是进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所高等小学堂是1904年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朱德在这里学习了6个月后又转到顺庆府中学堂就读。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张澜先生。张澜，字表方，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他被选送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其间，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日本的维新富强，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因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被朝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张澜回到四川后，曾赴成都任四川游（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顺庆主持教育。他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驱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学堂的理科教师名叫刘寿川，仪陇县人，也是留日学生。他给学生们讲授物理、化学课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教给学生们使用。有一次上物理课，他在讲述火车的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制造火车？刘寿川对此感慨不已，他转而讲起日本的历史……，最后，又激动地说，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走向先进，科学给日本带来生机，唯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刘寿川先生的话，对朱德来说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也曾这样说过，然而，在这种环境中，朱德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张澜先生还在课堂上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类似张澜、刘寿川先生的这些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言论，给朱德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还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在他看过的几本书中，他最佩服邹容写的《革命军》，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还不很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如何进行革命，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应该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拯救国家。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为了供朱德去成都求学，朱世连又借了一笔钱。朱德后来回忆说：到顺庆和成都去读书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成都是四川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朱德步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时，一幅范围广泛、内容深刻的社会画卷展现在他的面前。那时，成都已兴办起机器制造局、兵工厂、造币厂等使用新式机器的工厂，还有从事缫

---

刘白羽：《朱德将军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丝、棉纺、丝纺的家庭手工业。特别是能显示城市繁荣的商业资本也在进一步发展，街道两侧，店铺林立，还有外国人开办的洋行商号。在兴办学堂的风气下，官办、民办、教会办的各式学堂应运而生，鼓吹新法，传播新闻的报纸也开始出现在成都街头，使初到成都的朱德感到：“这算是从极端腐败落后中间来了一次新的整顿。”

朱德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最终他还是选择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因为家中是不会同意他去武备学堂的，他们向来轻视当兵的。朱德之所以选择体育专科，一是因为他身体素质好且又有兴趣；二是因为他相信体育可以增强国人体魄，将来他要做一名教师，改变洋人诬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状况。

进入体育学堂后，朱德很快就对学堂里设置的新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所学堂创建仅仅1年，主要是以统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和口令，培养体育教员为教学宗旨。学习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兵学、教练、体操、器械，其中体操又有枪操和普通操之分。在这里，他勤学苦练，努力掌握专业技能。特别是上体育课时，他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因而很快就掌握了单杠、双杠、木马、体操的基本要领。在他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为83.7分，名列前十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尽管学堂里的学习很紧张，朱德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斗争在激烈进行着。而学堂也如同社会，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入学不久，朱德就发现，有的教师的辫子是假的，他们把一条辫子缝在帽子上，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叛逆朝廷的行为，会被定为死罪的。然而朱德对这些如此胆大的教师十分崇敬。“尤其喜欢听戴假辫子的教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

这时，他开始注意到同盟会的活动，因为他们宣传革命思想，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政府。有一天，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底下塞进一张《民报》。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朱德如获至宝，读了再读，其中揭露立宪派的主张实际上是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读过之后，朱德又把它塞进另外同学的枕头下。他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同盟会。于是，他多方探听谁是同盟会会员，结果却使他感到失望，谁也没有能告诉他有关加入同盟会的情况。但他思想上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在敬的介绍下，朱德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朱德结束了学业。在这一年中，他的思想又进了一步，他感到自己的眼界更开阔了，他要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奉献给家乡父老。

---

《朱德将军传》，第24页。

《朱德自传》

## 初试锋芒

从体育学堂毕业后，朱德选择了教师的职业。这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意识在他的思想里产生着强烈的作用，他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推广国民尚武精神，使学生们的身体强健起来，使中国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

1908年春，朱德接受刘寿川先生的聘请，从成都回到仪陇县，担任了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师，兼管庶务和教务。同时接受聘请的还有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别担任文理科教师。

坐落在金城山下的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前身称“金粟书院”。1906年改办县高等小学堂之后，把持学堂事务的仍是那些代表保守势力的旧派人物，他们认为千百年形成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教授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一类的旧学内容。

朱德担任体育教师之初，就遇到来自家庭内部和社会外界的双重阻力。

开学前，朱德回到了马鞍场。家人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们让朱德坐在堂屋的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用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朱德看到家中依然破旧，生活愈加贫困，而且欠了许多债务。对于家人的“厚待”，他愈发不安起来。他把当体育教师的事告诉了家人，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德后来回忆说：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我父亲问道，体育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以后，他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而结果却是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他大叫大闹道，苦力也会这个！他接着跑出家门，一直到我走，他也没回来。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在啜泣。”朱德倾尽全力向伯父作着解释，告诉伯父，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体育是新式教育的一部分。他十分清楚自己“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然而，尽管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并不打算再回到大山里去，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离开马鞍场的那天，一向疼爱他的伯父，送出他好几里路才回去。朱德望着伯父的背影，伤心地哭了。

回到县城，朱德全力地投入到办学的工作中。

偏狭、闭塞的山城，传统势力依然主宰着这里的一切，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开学伊始，朱德就感到周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几个人带着新学走进陈腐的氛围，无疑是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下去。

朱德等进入学堂后，接管了学堂的事务，更引起旧派势力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朱德等人。

果然，不久就传出许多流言蜚语，说他们教的新学，有损国粹；说他们头戴假辫子，是假洋鬼子；说他们传授野蛮思想。有人还贴出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86 页。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88 页。

谣言和诽谤没有动摇朱德等人兴办新学的信心，他们积极向学生及其家长宣传新学的进步意义，鼓励学生接受新学教育。于是，陆续有一些学生从私塾来到学堂就读。

保守势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更无法容忍朱德这样的农家子弟在上层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他们在知县面前诬告朱德教的体育课是让学生脱光衣服，简直是有伤风化，有失体统。知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封闭学堂，朱德等被带到了县衙门。知县斥责朱德为教授猥亵的课程，欲以治罪。朱德据理力争，说明开设体育课的意义，揭穿了诬告者的谎言。知县无可奈何，况且学堂是朝廷诏令兴办，被迫同意学堂复课。由此，学堂的名声更响了，学生由开学时的 12 人增加到 70 多人。

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仍在进行着，保守势力无法利用权势阻止新学的推广，就采取卑鄙的手段进行报复。他们雇用流氓把粪尿倒在学堂门口，在街上袭击学生。后来，朱德在讲述这一次斗争时说：“为了让学生学会自卫，我教学生学武术，拳棒都用得上。我们手拿棍棒同街上的暴徒大打一场，并且抓住几个流氓，送到官府去。这些家伙为了顾全自己，也只好把出钱的人供了出来。”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动荡，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和农民群众的斗争，震撼着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基础，清朝统治者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社会的动荡同样波及到四川，波及到仪陇，也影响着朱德。一年的教师生活，使他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的顽固，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同时，也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地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年底，朱德接连收到敬 从成都写来的信，劝他一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朋友们也鼓励他前往。于是，朱德在作出辞职的决定之后，即告别了朋友们，踏上了回马鞍场的山路。

这一次回家，朱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要去成都读书，但无论是朱德，还是他的家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以致当他离家前往成都时，家中竟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别离竟是 50 余年，直到 1960 年他才重返故乡。

---

《朱德自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92 页。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92 页。

## 艰难的跋涉

1909年初,23岁的朱德再次来到成都,他准备与敬一一同到云南去投考讲武堂。

朱德为什么要到云南去呢?当时,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东北三省在日俄战争之后,已成为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法、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法国为了掠夺云南的矿产资源,加快修筑越南至云南的铁路。美国也伺机侵略云南片马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朱德痛感危亡在即,非救国不可。而东北和云南比较,他认为去云南更实际一些。

道路艰难,颇费时日。朱德和敬一从成都乘船,顺岷江南下,沿江两岸的奇异风光吸引着朱德。船到叙府(今宜宾),他们离船上岸,渡过长江,进入云南。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长途跋涉中,朱德真正体会到“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间,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昆明,地处云南省中部、滇池盆地北缘,气候温和,素有“春城”之称。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置县治,后改为中庆路治。明朝以后升至云南省治,成为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朱德和敬一在一萧姓人家的客栈里住了下来。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说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家乡的想法,并且说明自己并不是要到成都读书,而是来到云南准备投考讲武堂,当一名军人。他知道,无论是去成都,还是来云南,家里人都是不赞成的,当初回家时的情形就证实了这一点。家人的想法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他们花费多年心血培养出来的朱德能做官、挣钱,使朱家从苦难的煎熬中摆脱出来。然而,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朱德来说,他既不可能重新回到世代务农的家庭中去,也不愿意循着席聘三先生走过的路默默地度过一生,他要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第二天,敬一给在讲武堂里的一位成都老乡写了一封信,希望能通过那位老乡介绍进入讲武堂。因为讲武堂主要是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若没有当地老住户或有权势人家的担保,是很难进入讲武堂的。

不久,敬一的朋友来了,把他俩带到当时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第七十四协(相当于旅)驻防的地方——巫家坝。这里驻扎着一个由川籍人组成的步兵标(相当于团),标里的军官已在云南多年,经他们介绍是可以进入讲武堂的。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一在一位川籍军官的介绍下,也参加了考试。两人的成绩都合格,这使他们万分高兴。可是,等到公布录取名单时,朱德大失所望,榜上没有他的名字,而敬一却被录取了。朱德苦思冥想,弄不明白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敬一带着几分不安告诉朱德,他在报名时,把籍贯改写成云南昭通府大关厅。听了敬一的话,朱德才弄清个中原委,他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一次教训,我决定以后也不能那么照实办事了。”

这时,最使他为难的是,带来的盘缠已所剩无几,他必须想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以期寻找进入讲武堂的机会。于是,他再次找到那个川籍军官,要求入伍当兵,他的要求立即得到应允。那个川籍军官对他说,先当兵也是

一个办法，因为讲武堂招生章程有个规定，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通过保荐进入讲武堂学习。朱德在填写入营登记表时，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把籍贯改写成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并且把原来使用的名字“朱建德”改成“朱德”。

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当时，一般人是不愿意当兵的，不仅鄙视这一职业，而且吃不了那种苦，除非衣食无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选择这条路，更何况是读书人，决不愿当一名大兵。朱德在兵营中，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做许多杂役，尽管如此，他还是踏踏实实地认真去做。在这里，朱德还结识了3个当兵的朋友，他猜想这几位朋友可能是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的成员。结识这几位朋友，为他后来加入哥老会，开展反清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基本训练结束后，朱德因为文化程度高的缘故，升任队（相当于连）部司书生（即文书）。不久，由于他努力工作，经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推荐，再次投考讲武堂。这一次考试的结果，使他如愿以偿。12月，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对于几经周折所取得的成功，他感到由衷地喜悦。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如果说，决心离开仪陇是朱德一生中作出的重要抉择之一的話，那么，进入讲武堂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在这条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 三 在云南讲武堂



## 起点

1910年2月，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课了。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教育生活。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为了适应清政府培养军事人才的需要创建的，教职员中如李根源、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1909年，这些人回国后，除少部分到新军中充任中级军官外，大部分被分发去筹办讲武堂。

讲武堂分为甲、乙、丙3个班，又分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00余人。甲、乙两班的学生系选调新军十九镇和巡防营的中下级军官，丙班学生系招收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甲、乙班学制为1年，丙班为两年半。

讲武堂的学科和术科都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安排的，功课繁重，要求严格。学堂规定，丙班学生需先学1年的普通学科和普通军事学（又称军事学小教程），计有国文、伦理、算术、地理、历史、外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等课程。而后再专门学习军事学科，如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马学等。各兵科又学各科的典、范、令；术科学习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

开学之初，有两件事给朱德留下较深的印象。

入校后，他们看到留日的教官们都没有留辫发，于是，不少学生受了《清议报》上《辫发史》的影响，不约而同的将辫发剪去，在当时，剪发是叛逆的行为，被视为对清王朝的造反举动。云贵总督李经羲得知此事，甚为恼火，打算解散讲武堂。时任学堂监督的李根源（4月即接任总办一职）解释说，留有辫发妨碍操练，并没有其他想法。他还力劝李经羲对此事不能认真，权作多养一个兵。这样才使讲武堂免于解散。

4月初，正值滇越铁路修成通车，通车典礼在昆明车站举行。典礼当天，李根源把学生们召集起来，慷慨激昂地说道：法国把滇越铁路修到昆明，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国家不但修不起铁路，甚至将国家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我们作为军人，有守土卫国之责，大家应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此耻辱。今天学堂放假一天，作为纪念。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一天，放假后可到车站去看看。李根源说到痛心处，不禁流下眼泪。放假这天，朱德和同学们来到火车站，当他们看到耀武扬威的法国人，看到火车头上插着的法国三色旗，大家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悲愤，禁不住痛哭起来。回校后，国文课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要求同学们写一篇作文。这件事在朱德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1937年，他在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说到，当最后一颗道钉钉好后，云南讲武堂的全体人员都去观看第一列火车进站。他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看到火车进站时，一位教官突然哭泣起来，大家都跟着哭了

---

滇越铁路，这是指中国云南省境内昆明至河口一段铁路，它与越南境内铁路相接。

起来。

每天清晨，当号声响彻承华圃上空的时刻，学生们在教官的带领下，齐聚在大操场上，随即唱起讲武堂的堂歌：

风云滚滚，  
感觉它黄狮一梦醒。  
同胞四万万，  
互相奋起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  
携手从军去。  
但凭那团结力，  
旋转新乾坤。  
哪怕它欧风美雨，  
来势颇凶狠。  
练成铁臂担重任，  
壮哉中国民！  
壮哉中国民！  
堪叹那世人，  
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  
二十世纪风潮紧，  
欧美人要瓜分。  
枕戈待旦，  
奔赴疆场。  
保家卫国，  
壮烈牺牲。  
要知从军事，  
是男儿本份。  
鼓起勇气向前进，  
壮哉中国民！  
壮哉中国民！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夏天没有暑假，只有星期日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这时的朱德，自信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因而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学习和训练看作是实现救国目标的必要条件，以饱满的热情、刻苦的精神对待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中，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从而使他的成绩很快就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

有一天，熄灯号已经吹过，李根源照例要去学生宿舍巡视一番。这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生在日本时就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多有接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出版《云南》杂志，为反对清王朝制造舆论。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旋升总办。他以“坚忍刻苦”为校训，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朱德后来曾著文称赞李根源说，当时“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

残忍的，对于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厉的。李根源先生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忱和灵活的手腕，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个革命的熔炉才得以保存下来”。

讲武堂的主楼是呈回字形的二层建筑，东西两侧是教室和教官的办公室、寝室，南北两侧是学生宿舍，内中的空场是小操场。李根源来到小操场时，发现学生宿舍的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亮光，便走进楼里查看究竟。正在看书的朱德发现有人走进房间，待到熄灯已来不及了。他见是李根源，连忙起身向李根源承认自己违犯校规的错误。一向严格要求学生的李根源为面前这个学生的坦诚所感动，当他弄清事情原委之后，并没有严厉批评朱德，而是关照朱德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通过这件事，朱德的名字就留在了李根源的脑海中。

第二天，李根源特意来到操场，他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地喜欢。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了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顾品珍的这种态度是事出有因的。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

李根源与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其刚愎自用、气度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1910年7月，朱德被选拔进入特别班学习。之前，总督李经羲奏请朝廷批准，将新军十九镇随营学堂的200名学生并入讲武堂丙班。同时，从丙班选拔优秀学生100名，编为特别班，作为讲武堂第三期学生（第一期为甲班，第二期为乙班）。

---

朱德：《辛亥回忆》，载1941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

参见李希泌：《我的父亲李根源》，《新编曲石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 同盟会员

朱德进入讲武堂后，就感受到这里充满着浓厚的反清气氛，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摆脱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束缚。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初，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无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给充满封建陈腐气息的中国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

讲武堂中的军事教官、主任教官，如赵康时、方声涛、罗佩金、唐继尧等，包括总办李根源，都是同盟会员。他们经常利用讲话或上课的机会，以各种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抨击清王朝腐朽卖国的丑恶行径，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激发学生的反清情绪。

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各种宣传鼓动革命的书报杂志应运而生，如《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洞庭波》、《新世纪》、《云南》等等。这些书报杂志传入云南，也传入讲武堂，在教官、学生中传播着。朱德对这些书报杂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办法弄来阅读。他对邹容著的《革命军》一书甚为欣赏，虽然他在顺庆读书时曾经看过这本书，但是，这时读起来兴味犹浓，有了更深的体会。当时，这些书报都是清政府禁止阅读的，云南提学使（相当于教育厅长）叶尔恺经常派人潜入学生宿舍，侦缉阅读书刊的人。他曾将革命书刊在讲武堂内传阅的事情密报李经羲，李派知府调查此事，知府又派知县去学校检查，经过几道衙门，消息早已传出。李根源得知此事，立即将书报分送密藏，等到检查时，一无所有。这样，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为了防范叶尔恺的爪牙，朱德在阅读这些书刊时，摆上《三国演义》一类的小说作掩护。

在讲武堂里，学生们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反清倾向。他们还组织了众多的团体，经常聚在一起，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尽管议论的话题范围很广，但主要的议题还是如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班上，朱德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鹤、王均、金汉鼎、杨燾、曹之骈、庐焘、曾钦仲、兰馥等。朱德后来回忆说：我在学员里面结交了几个朋友，“有几个是肯作自我牺牲的爱国者，也有几个是贪官污吏，或反复无常的军阀。”朱德在开学之初也曾组织过团体，后又约集范石生、杨如轩、唐淮源、李云鹤等人以五华山名，成立了一个叫“五华社”的小团体，他们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结拜金兰之交。

第一学期后的一天，曾和朱德共同组织过团体的一位同学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同盟会。对于同盟会以及它的组织者孙中山，朱德早在体育学堂上学时就已经听说。那时，他曾寻求加入同盟会，却没能实现愿望。此时，有人主动找他加入同盟会，他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他还是审慎地答复那个同学，待他考虑一番。回去后，朱德和朋友们述说他所遇到的这件事，大家看法不一，经过一番议论，朱德决定去找那位同学，答应他的要求。

不久，朱德终于如愿以偿，敌血宣誓，加入了同盟会。随后，在朱德的介绍下，“五华社”的成员也先后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在讲武堂内分作两支，教官为一支，学生为一支，每七八人为一个小组，各小组之间均无联系，每一小组仅有一人可与上一级联络，以防出现意外时，不至于受到牵连。朱德那个小组里还有范石生、庐焘等人。对于参加同盟会及在同盟会小组的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是第一学期后，”“我们的秘密小组会议总是谈军事起义。各种理论性的政治讨论很少，或根本没有。我们都是战神的信徒。由于国事的发展，我们才被迫拓宽了思路。”

朱德进入云南讲武堂的半年多时间里，思想上得到进一步地发展，作为他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加入同盟会，他开始走上了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

---

《朱德自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02 页。

## 良师益友

1911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使朱德结识了蔡锷。他对蔡锷的最初印象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随着交往的增多和了解的加深，他从内心敬佩和尊重这位只比自己大4岁的青年将领。

蔡锷，原名松坡、良寅，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曾师从樊锥、梁启超门下。在“军事救国”思想影响下，他先后进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士官学校期间，由于成绩优秀，他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淮被时人推崇为“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任职，督办军事学堂。1911年2月，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来到云南。这时他正在教练处（设在讲武堂内）等待派遣，并受十九镇镇统（相当于师长）钟麟同委托，编写一份向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文稿。

自从结识了蔡锷，朱德很快就为这位面颊清瘦、表情冷峻、不苟言笑的青年将领所吸引。也许是出于对蔡锷那不平凡经历的兴趣，也许是出于对蔡锷那敏捷的思路和干练的能力的敬佩，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蔡锷。可是，他发现蔡锷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决意要到蔡锷的住处去看一看。

一天，吃过晚饭，朱德来到讲武堂主楼旁的一处院落，这里原是讲武堂第一任总办高尔登的住所。

在蔡锷夫人的引导下，朱德走进蔡锷的办公室，他看到屋里的几架书橱摆放着各种书籍，不禁羡慕不已。

交谈中，朱德向蔡锷讲述了自己走出大山里的农舍，上新学堂，当体育教师以及千里跋涉投考讲武堂的经历，也讲述了自己从痛恨官府、地主的压迫到拥护变法维新，从立志“强身救国”、“教育救国”到决心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过程。他的坦诚、质朴的谈吐使蔡锷甚为欣赏。

然而，朱德却感到蔡锷虽然对他所谈的一切，特别对时政的看法没有任何不同的表示，但蔡锷在谈话中从不表露对清廷的不满之意。

在谈话中，他了解到蔡锷也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子弟，少年时期就立志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挽救危难中的民族。1900年，他曾从日本返国准备参加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后因奉唐命赴湖南，才幸免于难。之后，蔡锷痛感枪杆子的重要，重返日本，学习军事。同时，将自己原来的名字“良寅”改为“锷”，意思是砥砺锋锷、重振旗鼓。这些，使朱德感到在蔡锷的身上，潜藏着一种深远的韬晦大略。他后来回忆时谈到：“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此后，朱德经常到蔡锷那里去看书报。有的报纸“是他的家乡湖南的，有的则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其中有一些来自香港和东京。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并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蔡锷虽然允许朱德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览这些报纸，但他自己从来不对此发表意见。有时，朱德还从蔡锷那里借几本书带回去阅读。他读过有关介绍美国第一任总统乔

---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9页。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1页。

治·华盛顿生平的书，也读过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还有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意大利游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书籍。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写的游记。它为朱德展示了一个变幻多样的广阔天地：历史悠久的古罗马斗兽场，宏伟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美丽繁华的威尼斯水城，庞大的托拉斯企业，洛杉矶的森林公园。更能吸引他的还是康、梁把游历诸国所了解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历史背景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使朱德大开眼界。

在蔡锷那里，朱德还看到了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文中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治理部队的言论。蔡锷在每一章前附以按语，着重阐明章内的主旨和它的现实效用，从中可以看出蔡锷本人的治军思想。朱德知道，曾国藩和胡林翼都是效忠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但是，他们所讲的一些治兵的道理还是可以借鉴的。朱德细细地体味着文中的含义，同时，蔡锷也逐章地向他讲解，使他获益非浅。直到30年后，他已经担任了八路军的总指挥，还仍然认为蔡锷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对他带兵、作战有很多教益。

5月间，蔡锷被任命为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离开了讲武堂前往巫家坝就职。在短短的几十天里，共同的追求与理想而产生的共鸣，使朱德和蔡锷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朱德为能够结识这样一位有才干的良师益友感到欣慰。

---

参见朱德：《纪念云南起义》，载1941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

## 在辛亥革命中

1911年8月25岁的朱德作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毕业生跨进了新军十九镇的营盘。在讲武堂这座充满了革命思想的熔炉里，他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立志要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见习期满后，他被任命为左队（相当于连）司务长，授少尉衔，负责管理全队的枪支弹药、被服补给等后勤事务。

这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期。1908年11月，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仅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实际上执政的是他的生父、光绪的弟弟摄政王载沣。

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载沣掌握朝政后，首先剪除了握有重权的汉臣袁世凯，以袁患足疾为由，勒令其回籍“养病”，免掉了袁的一切职务。载沣以为这样既为光绪报了“戊戌之仇”，又可以巩固皇族在清廷中的地位。接着，他又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继续预备立宪。1909年，成立了各省的咨议局，次年在北京成立资政院。在外交、财政方面，继续出卖国家主权，特别是将东三省、湖广铁路修筑权以借款形式拱手让给外国列强，企图摆脱清王朝面临的困境。

然而，载沣的努力只能起着延缓封建王朝的作用，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袁世凯虽然回到河南彰德原籍，他在朝内的代理人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况皇族实行的“以满将统汉兵”的政策使满汉官兵的矛盾日渐扩大。资产阶级立宪派看出载沣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是“假立宪，真专制”的骗局，纷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清廷应允立即成立内阁，把预备立宪的期限从9年改为3年，即1913年实行开设议会。此外，载沣等人奉行慈禧“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遗训，不顾举国上下的反对，一意孤行，于1911年5月间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可是，它却成为清王朝迅速垮台的导火线。清廷在内政、外交上的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民的抗争，革命的条件日臻成熟。

在云南，革命的力量在积聚，扩大，革命党人积极策划起义。

由于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沿路人民极为愤慨，纷纷起来反对。其中以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尤为英勇。为此，四川总督赵尔丰拘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7名领导人。7月9日，当成都市民前往总督衙门示威请愿要求放人时，赵尔丰竟下令开枪，造成血案。从此，保路同志会改称同志军，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清的武装斗争。

四川发生的“动乱”的消息传到云南，昆明城里有关起义的传闻越来越多。按照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指示，朱德利用他担任司务长的便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士兵的鼓动工作。

当时，士兵中有相当多的人都参加了哥老会，因此，朱德找到了他在步兵标当兵时结识的3位哥老会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加入了哥老会。从此，朱德以哥老会会员的身份作掩护，经常出入巡防营。“士兵都是不识字的汉子，一辈子过着最困苦、最原始的生活”，“不过，有许多人很聪明，渴于寻求知识和新思想，令人十分感动。”他给士兵们介绍同盟会的政纲；讲



述清廷卖国求荣，把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外国列强的经过；讲述清廷腐败无能，却残酷欺压穷苦百姓的事实。

这时，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云南，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 10 月 10 日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他们闻风而动，纷纷举起推翻清朝统治的旗帜。

李根源、蔡锷等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 10 月 28 日夜，聚集在唐继尧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30 日（农历九月初九）午夜三鼓时（即夜 12 时）举事，由蔡锷率七十四标、炮十九标在巫家坝起兵，进南城攻打总督衙门等处；由李根源、李鸿祥率七十三标在北校场起兵，进北城攻打军械局等处。

总督李经羲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为防止云南发生不测，下令巡防营和督署卫队严加防范。同时和镇统钟麟同商议，拟定了一个捕杀拥护共和的军官的计划。幸而为蔡锷所阻，才避免了李、钟大开杀戒。同时，钟麟同下令各营弹药除训练用外，其余一律收交军械局，整座昆明城正酝酿着一场激烈的搏斗。

朱德接到起义的通知后，立即传达给他所联络的哥老会兄弟，要他们做好准备。

10 月 30 日晚 9 时许，队官禄国藩召集左队各棚长（相当于排长）、包括朱德在内布置任务。禄国藩把口令、标记和攻击目标述说完毕，又指定一个棚长担任前锋区队官，率前锋区队攻击前进，代行队官作战指挥职权。

行动刚开始，朱德突然接到命令，由他担任前锋区队官，带领部队迅速进城。原来，先前任命的那个区队官带着几名亲信逃跑了。朱德率前锋区队来到财神宫时，守卫在这里的巡防营官兵得知起义的消息，纷纷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中。

朱德率队进城后，迅速向总督衙门穿插。据守在总督衙门的卫队和辐重营凭借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向起义军猛烈射击。由于弹药紧缺，至 31 日上午 11 时，起义军仍未能攻下总督衙门。这时，军械局被攻克，弹药得以补充，士气大振，起义军频频发动攻击。朱德率前锋区队首先冲破守敌防线，进入总督衙门。

“光复了！共和了！”昆明城沸腾起来。11 月初，以蔡锷为首的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宣布成立。

1961 年，朱德为纪念辛亥云南起义，写成《辛亥革命杂咏》，其中有两首写道：

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

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

云南光复后，为援助四川革命党人，都督府派遣两个梯团入川。朱德随第一梯团赴川半年，其间，升任连长，授上尉衔。1912 年 3 月，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宣告四川统一，援川滇军始返云南。5 月，在昆明举行的援川军庆功会上，朱德获得“复兴”和“援川”两枚勋章，以表彰在昆明起

义和援川作战中所立勋绩。秋季，他又重返讲武堂，担任生徒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

这一年，他与萧菊芳 在昆明结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给黑暗、沉闷的中国带来一线希望与光明。朱德为此感到欣慰，他热切地期待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一个统一的国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不再受封建专制的摧残；一个进步的国家，有廉洁的政府；一个幸福的国家，逐渐走向富裕。

然而，朱德所憧憬的统一、民主、独立、进步的国家却始终没有出现，残酷的现实使中国重新陷入苦难的境地，“中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已经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 4年后，朱德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又投入到维护民国的战斗中。

---

萧菊芳，云南昆明人，昆明师范学堂学生，1919年6月病逝。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2页。

#### 四 誓拚热血铸中华

## 再造共和

1912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出现重大的变化。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清朝200多年的统治，也结束了2000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清王朝宣布退位是以革命党人作出重大妥协让步换来的。在清帝退位20多天后，孙中山被迫辞职，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组成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至此，革命党人苦心奋斗的辛亥革命终未达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而以失败宣告结束。朱德在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时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在主观方面，即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依然没有改变在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性质。

朱德在讲武堂担任教官的一年间，耳闻目睹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是怎样惨遭刺杀的；袁世凯是怎样继承清王朝的衣钵，对外继续向帝国主义列强出卖中国主权，对内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的。更使朱德感到担心的是，他所敬重的良师益友蔡锷接到袁世凯的调令，离滇赴京任职。他认为：蔡锷“如果拒绝，云南就要被袁世凯的军队夷平，蔡锷也只能在被暗杀和逃亡之间选择一条路。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任职，也许能保住他的性命。蔡锷的计划仍然是维持住云南革命政权，把全省置于国民党控制下，以便共和派重整旗鼓”。

1913年秋，朱德回到他原来的部队，升任步二团一营营长，授少校军衔。次年初，朱德随部奉调迤南。朱德所在的步二团调往迤南的主要原因是，当时驻在临安（今建水）一带的步三团与地方武装发生冲突，兵营被捣毁，军械库遭抢。事件发生后，刚刚从贵州返回云南的新任都督唐继尧命令步二团急赴临安弹压。事变平定，步二团即留在临安、蒙自、阿迷（今开远）、个旧一带驻防，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维持地方治安；一是加强迤南地区的防务。迤南地区是南入省城的必经之地，也是滇越铁路经过之地。因此，加强防务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朱德在这里驻防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同法国帝国主义收买的土匪和蛮子的作战中，摸索出一系列游击战术的经验。1937年，朱德回忆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外国女作家宁谟·韦尔斯对此评价说，朱德“学得特殊的游击战术，这使他在中、法交界的戍地上和在四川、云南的山堡上给予红军绝大的贡献”。此间，他渐次升任团副、团长，授上校军衔。

在迤南的两年中，尽管朱德在偏远的山峦丛林中作战，却依然关注着国

---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2页。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员。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续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19、116页。

家的命运和前途。他看到“报纸上全无令人兴奋的消息，都是些令人气短的报道”，内心感到万分忧虑。

自“二次革命”后，中国进入民国初期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

1913年10月，国会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不久，干脆解散了国会。1914年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临时约法》，使袁成为“合法”的终身总统，并有权指定继承人。实际上，辛亥革命所争得的民主政制——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至此已烟消云散。与清王朝不同的，不过是挂着“民国”的招牌而已。障碍既已排除，于是，1915年5月，袁世凯在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就放心地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在公开场合，袁世凯竭力表白说：“辛亥革命初起始，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他的一番冠冕堂皇的声明，犹如为自己最终的下场作了最好的注脚。私下里，袁世凯却鼓动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筹安会”、“大典筹备处”，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规定次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对。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滇军中反对帝制的将领多次秘商，制定了一个偷袭四川的军事计划，估计20天可以完成，然后举兵讨袁。步一团长邓泰中率部先行昭通候命。12月19日，在北京的蔡锷辗转日本、香港、越南回到了昆明，于当天在五华山召集会议，商议讨袁事宜。22日，滇军将领在护国寺再次开会，决定组织护国军，推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镇守后方；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进而北伐；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防堵广东龙济光部进攻滇南。25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名向各省发出讨伐袁世凯的通电，宣告云南独立。

此时，正在蒙自的朱德从报纸上看到的复辟帝制的喧嚣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抨击，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12月下旬的一天，他在街头突然与一位老朋友邂逅。那人向他鞠躬行礼，顾不得寒暄，只得嘱咐他晚上务必到城外小庙见面，随即匆匆离去。

晚上，朱德和几个反对帝制的军官来到城外的小庙里，来人取出一块碎布交给朱德，碎布上的字迹他是熟悉的，是蔡锷写来的，叫他按传令人的命令行事。来人告诉他，蔡锷已回到昆明，将于25日宣布独立，反对帝制，讨伐袁世凯。要他届时务必率部返回昆明，参加起义。

朱德听罢，惊喜万分，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25日黎明，朱德率部向师部进攻，帝制派军官早已闻风逃遁。于是，他集合部队，说明云南发生的事情，得到全体官兵的拥护，宣誓讨伐袁世凯，再造共和。起义队伍随即登上火车，开赴昆明。

朱德来到护国军司令部时，蔡锷正在开会。朱德后来谈到与蔡锷见面的情况时说：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在威胁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

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松坡先生，你身患重病，不能再去前线作战了。”朱德关切地劝慰说。

“有什么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蔡锷强作笑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朱德望着蔡锷那削瘦、苍白的脸，很担心蔡锷的身体会垮下来。他知道，劝说是无效的。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预期举行的登基大典在日本等国的反对下未能如愿，但还是启用了中华帝国的名称，改用洪宪纪元，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如何对付云南护国军？5日，他在丰泽园召集会议，任命曹錕为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副总司令，率部前往川南，阻止护国军北上。

护国军第一军下辖三个梯团，每一梯团辖两个支队，每一支队辖两个营，具体任务是：第一梯团经昭通向四川叙府进攻；第二、三梯团经贵州毕节向四川泸州进攻。

1月16日始，第二梯团、总司令部、第三梯团依次从昆明出发。

朱德回到昆明后，调任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责组训新兵。1月6日，所部编为滇军步十团，继而编为第三梯团第六支队。22日，朱德率第六支队自昆明出发，他骑在马上，身后一面绣有“朱”字的黄底黑边三角旗迎风飘舞，他注视着行进中的部队，一股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为再造共和去冲锋陷阵。

## 在护国战争中（上）

部队行进到贵州境内，天气越来越冷，并且飘起了雪花，泥泞的山路给部队行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朱德和士兵们一样，弃马步行，艰难地向前走着……

此刻，先行进入四川的第三支队在支队长董鸿勋的带领下，于2月4日抵达纳溪，同原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会合。刘存厚，四川涪县人，与蔡锷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应召入滇，充任讲武堂教官，辛亥昆明起义时，是朱德所在营的管带（即营长）。后返回四川，渐次升任师长一职。蔡锷回昆明后，曾电请刘部旅长雷飙争取刘存厚讨袁。刘存厚对此极力赞成。不几日，蔡又电其迅速作好准备，相机策援。护国军起，刘存厚决意与滇军通力合作，共同讨袁。因此，当他接到四川将军陈宦要他在古蔺雪山关阻击护国军的命令后，一直没有执行。1916年1月31日，他又以护国川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袁。

2月6日，董鸿勋支队与刘存厚部陈礼门团合力攻克泸州对岸的兰田坝，随即渡过长江，向泸州五峰顶进攻。此时，征滇军张敬尧所部陆续抵达泸州，而后从护国军两翼南渡长江，绕至董、陈部后方，切断了他们与刘存厚的联系和退路。护国军腹背受敌，又由于陈礼门的大意疏忽，致使护国军一战而败。陈礼门自尽身亡，董鸿勋率队冲出包围，却遭到严重损失。

2月15日，朱德率第六支队到达永宁后，即得到董鸿勋支队作战失利的消息。这时，蔡锷发来急电，命令他立即兼程急进，赶到纳溪，接替董鸿勋的第三支队长职，遗职由军部参谋王秉钧接替。朱德率部经过两天急进，兼程百余里，于17日到达纳溪前线。此刻，阵地上正在展开激烈的战斗，第三支队余部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进攻。这支部队是朱德在云南蒙自时带出来的，士兵们经历过与顽匪的无数次战斗，特别勇敢顽强。尽管部队损失很大，但是，战斗的锐气仍然不减。他整编好部队，并且宣布了战场纪律：不畏死，勇敢冲锋。士兵退，班长杀；班长退，排长杀；排长退，连长杀；连长退，营长杀；营长退，团长杀；团长退，全军杀。接着，部队在朱德的带领下，投入到保卫纳溪的战斗中。

纳溪城，居于长江南岸，沿江向北一二十里处即是兰田坝。这里是南入泸州，北下川南的咽喉要地，因此，双方争夺得十分激烈。

这时，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张敬尧率领的征滇军，加上驻守泸州的川军熊祥生旅，计1.5万余人。而蔡锷率领的第一军仅3100余人，加上刘存厚部，不过6000人。因此，进行持久的战斗于护国军很不利。

2月18日，朱德接到命令，要求当日务必作好准备，次日拂晓发动进攻。第三支队的任务是向北洋军正面阵地菱角塘作为攻击目标。

2月19日，天将泛白，随着一声剧烈的炮响，护国军的进攻开始了。朱德支队的左翼是第五支队（支队长禄国藩），向北洋军右翼兰田坝进攻；朱德支队的右翼是第团支队（支队长何海清），向北洋军左翼双河场进攻。

战斗持续到正午，战场上弥漫着硝烟，枪声、炮声令人震耳欲聋。号称“常胜军”的张敬尧部凭借有利的地势和优良的武器，拚死顽抗。朱德率领部队经过多次冲锋，仍未奏效。他决定以一营在正面佯攻，另一营则向北洋军侧翼运动，实行迂回进攻。约莫一个时辰，北洋军阵地上的火力减弱。他知道，这是迂回部队已开始向敌军进攻了……

突破守敌的第一道防线后，朱德率部继续向纵深前进。没想到，却遇到了更猛烈的炮火阻击。进攻部队被敌军火力压在高地前的水田里，无法前进，伤亡人员不断增加，营长曹之骅也身挂重彩。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只得命令部队撤回原阵地，防御休整。

在以后的几天里，朱德按照梯团长赵又新的命令，固守在阵地上，积极休整补充，准备进行反攻。

战场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尽管护国军在战斗中给北洋军以重创。但是，由于战斗减员和弹药不足，很难给予敌军以致命的打击。蔡锷接连致电唐继尧，请其迅速发运弹药，并且建议：因北洋军倾其全力投入泸州、纳溪战场，望速派兵进取綦江、重庆，以切断北洋军退路。

23日，蔡锷从永宁到达纳溪，约同刘存厚召集会议，会商作战计划。蔡锷认为，就实力而言，北洋军占了较大优势，而护国军的兵员、饷弹一时不能得到补充，相持日久，于护国军非常不利。因此，在军事上只有速战速决，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同时，还要发动各省力量共同讨袁，才能达到再造共和的目的。最后，蔡锷特别强调，纳溪是主要战场，一旦失利，护国军将全军崩溃。会议决定，调叙府一部前来纳溪参战，28日发动全面进攻。

回到三支队，朱德立即集合官兵，鼓励大家振奋斗志，勇敢杀敌。

2月的夜晚，寒气袭人。朱德为战场的形势所困扰，没有丝毫睡意，他思索着如何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第二天，他召集起各营连主官，向他们宣布了组织敢死队突袭敌军阵地的计划，并且布置了各营连的具体战斗任务。

27日夜，数百名官兵聚集在营地上，等待着支队长朱德向他们下达命令。朱德环视着衣衫单薄的士兵们，高声说道，我们为保卫共和而战，生为共和的人，死为共和的鬼，不推翻袁贼，我朱德死不瞑目。官兵们听罢，十分感动，纷纷表示要奋勇冲锋，顽强战斗。接着，朱德挑选了一批敢死队员跟随他一起行动。当晚，朱德就带领数十名敢死队员趁着天黑，进入敌军阵地前的开阔地带潜伏起来。

拂晓，随着总攻信号的发出，朱德率领敢死队员突然插入敌军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猝不及防的北洋兵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敢死队员们越杀越勇，待到后续部队赶来，他们尾随着一面绣有“朱”字的三角形大旗，接连攻破敌军的几处阵地，终于取得战斗的胜利。这一仗，使朱德赢得了勇敢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流传起“黄柜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的佳话。

然而，失利的北洋军又重新集结兵力，向护国军阵地疯狂地反扑过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激战中，朱德每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他与士兵们同餐共宿，并肩作战。但是，后方的兵员、饷弹始终未能运到，致使官兵们“衣不蔽体、食无宿粮”，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官兵们的心头。

战事旷日持久，仗越打越艰苦，护国军始终没能攻破敌军的防线。3月3日，叙府方面传来消息，左路部队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叙府。鉴于护国军既无援兵，又缺饷械的困难处境，蔡锷接受罗佩金等的建议，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决定全军暂时退出纳溪，撤至大洲驿一线休整。

---

黄指黄永社，廖指廖月江，金指金汉鼎，朱指朱德。

引自《松坡遗墨》。



3月7日午后12时，护国军开始全线撤退，朱德奉命率第三支队担任后卫。据当时担任总司令部参谋的祝鸿基回忆：他奉命协助顾品珍指挥全军后撤。3月8日早8时，他随顾品珍到达渠坝驿，适遇蔡锷等将要用早餐。席间蔡锷对顾品珍说，朱德支队长尚未撤退，他将要死在你们手里。顾听后，连声表示不干了。后经他说明朱支队长已撤下来，顾梯团长为撤退事也很辛苦，方才作罢。

自退兵后，朱德一直处在困惑之中。他不明白，唐继尧在誓师之际，明确表示：他将竭尽全力投入到护国讨袁的事业中去，为什么前线兵员、饷械告急，蔡锷连电催促支援，唐继尧却漠然处之，不积极发运兵员、饷械呢？他哪里知道，坐守昆明的唐继尧，当初对颇孚人望的蔡锷返回云南就心怀不快。蔡锷领衔出师，正中其下怀，所以，他愿意分给一部分兵力。但是，唐继尧出于个人的目的，并不愿意向入川作战的护国军提供充足的后勤支援。

---

参见祝鸿基：《第一军入川讨袁概述》，《护国讨袁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 在护国战争中（下）

3月中旬的一天，朱德被召去大洲驿参加军事会议。在这里，他见到了从叙府调来的新任第一支队长金汉鼎（接替邓泰中职）。两人相对无言，都为目前的战局感到忧虑。这种忧虑倒不是因为北洋军力量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护国军弹药不足，无法摧毁敌军的防线。

会议室的气氛异常凝重，与会者静静聆听着蔡锷的讲话：“……目前局势十分严重，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后援何时能到，尚无期日，所以，此役关系重大。短兵相接勇者胜，唯有取胜，方能完成护国讨袁之重任。”蔡锷强作精神，拖着嘶哑的嗓音说着。随后，总参谋长罗佩金开始向与会者布置任务：顾品珍梯团攻击敌军右翼阵地，而后绕敌军后方向纳溪城进攻；何海清支队向敌中部阵地正面佯攻，朱德支队、金汉鼎支队担任主攻，向敌中部阵地左右两翼迂回侧击；川军张煦支队向兰田坝进攻，阻击泸州方面渡江支援；川军廖月江支队位于朱、张支队之间，协同进攻。余部作为预备队待机行动。总攻时间为17日拂晓。

会议开过，大家各自散去。朱德望着蔡锷那苍白、疲倦的面容，深为蔡的身体担忧，所以关心地提请蔡要保重身体，尽早治疗。蔡锷却问起朱德这两年是如何度过的。朱德在谈及这两年的情况时，深情地告诉蔡锷，他始终没有忘记先生的教诲，常常把《曾胡治兵语录》等兵书带在身边，注重在实战中加以应用。

话别时，蔡锷再次向朱德提及这次反攻的重要性，特别嘱咐他要与金汉鼎支队相互配合，尽快攻克朝阳观和棉花坡。

战前，营地的气氛是紧张的。官兵们十分清楚此役的重要，倘若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

3月下日凌晨，总攻开始。护国军从大洲驿一线向纳溪一线的守敌展开了反击。

经过数日激战，朱德率领的第三支队不断突破敌军防线，相继攻克三块石、龙车山、观音榜等处，直抵兰田坝附近的南寿山下。

在作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的态势，朱德很注重战术的运用，经常以少数兵力吸引敌军主力，而以主力攻击敌之侧背，使敌军防不胜防。同时，他的部队还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援。他后来回忆说：“在这次推翻帝制的战争里，我们第一次在农民中展开群众工作”，“在哥老会领导下，农民武装起来，攻击敌军运输，他们把粮食和弹药转运给我们。”有一次，牧童们跑来向朱德报告说，他们知道敌军的炮兵阵地在什么地方。朱德便派一突击队随牧童迂回至敌炮兵阵地附近隐蔽起来，约定放火为号。当战斗激烈进行时，突击队出其不意向敌炮兵阵地猛攻，而后放起火来。朱德见浓烟升腾，知道奇袭成功，随即命令部队发起冲锋。顿时，号角声、喊杀声震撼着山野。敌军腹背受攻，又遭到三支队炮火的猛烈射击，阵脚大乱，夺路溃逃。

从17日到23日的7天里，护国军在绵延百余里的战线上，重创北洋军，“毙伤敌军共九百多人（俘虏不算）、缴获大炮七门、机枪九挺、步枪九百余支、炮弹二百多发、子弹十三万余发。”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

金汉鼎：《护国军入川与北军作战经过》，《护国讨袁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版，第74页。

就在护国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深居北京中南海的袁世凯，已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冯国璋称病告假，张勋的要挟，广西耀武上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袁世凯忧虑重重，不得不低眉笑颜恳请徐、段再次“出山”。然而，他的一切努力为时已晚，众将臣即使答应了他的要求，也是阳奉阴违，不再死心塌地为他卖命了。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这时，督军四川的陈宦、曹锟、张敬尧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失魂落魄，寝食不安，先后致信蔡锷，要求停战议和。

3月29日，蔡锷来到前线巡视，看到部队久战疲乏，后方仍未按时增援，而战线太长，反攻也有困难，因此接受了停战的建议。随即派刘云峰赴泸州与张敬尧谈判。双方签约，自31日始，停战1个星期。4月7日，期限满后，又续停1个月。停战期间，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宦、湖南汤芑铭等先后宣布独立。特别是陈、汤的倒戈，使袁世凯感到众叛亲离，难以再继续他的统治了。6月6日，袁世凯于忧愤中一命归天。在四川的张敬尧见大势已去，即率部撤出泸州。

11日，第三支队因作战有功，受到总司令部的嘉奖，获得首先进入泸州的荣誉。

纳溪战役历时45天（自2月6日至3月23日），护国军给予北洋军以沉重的打击，对推翻帝制、再造共和立下巨大的功绩。朱德认为：“护国军这一次战役，它所负有的重要意义是不亚于辛亥革命的。”朱德在谈到这次战役的情况时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但是，“我的部队损失也很大，第十团（第三支队）不得不补充三次。滇军至今还赫赫有名，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得来的。”

然而，几个月后，一件令他悲痛的事情发生了。

这年7月，蔡锷赴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8月，因喉疾恶化，告假赴日本治疗。当他途经泸州时，在这里停留了数日。

几天里，朱德伴守在蔡锷的病床前，悉心照料着他所敬佩的恩师。尽管他知道蔡锷已是膏肓痼疾，性命难保。但是，他还是企望能通过他的照料，使蔡锷的病情好转。当载着蔡锷的江轮缓缓驶离泸州码头时，他的心情异常的沉重……

11月间，噩耗从东瀛传来。蔡锷终于一病不起，在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病逝，时年34岁。

朱德得知蔡锷病逝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悲哀之际，他写了一副挽联，以寄托对蔡锷的思念。挽联写道：

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  
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太难言。  
蔡锷的病逝，使他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长时间地陷入悲痛之中。

---

《朱德自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页。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陶体贵：《沛云堂立雪杂录》。

## 初识孙炳文

1916年10月，朱德率第三支队从泸州来到南溪驻扎。

南溪与泸州相距百余里，是泸州通往叙府的必经之路。

冬季里，朱德尚未摆脱对蔡锷将军的追念之情，避居房中，看书、写字，很少涉足户外。

1917年初春的一天，当地士绅孙炳章偕其弟孙炳文登门拜访。孙炳章把孙炳文介绍给朱德，说他新近回乡探亲，久仰朱支队长大名，一定要来探望。朱德含笑谦让，吩咐卫士沏茶待客。

落座后，孙炳文告诉朱德，他在成都时，与老同盟会员李贞白结识，两人常在一起谈论古今人物。谈话中，李贞白向他提起玉阶支队长，认为是一杰出人才，因护国战争而名震川蜀，劝他有机会一定要与玉阶支队长面叙。

“不敢当，贞白先生过奖了，我哪里是啥子杰出之士。”朱德谦逊地说。

“贞白先生是不会轻易夸奖一个人的，他能有如此评价，说明玉阶支队长决非凡人鼠辈，定有过人之才。”孙炳文笑着称赞说。

寒暄过后，朱德询问起孙炳文的经历。他了解到，孙炳文，字明，比他年长一岁。1908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因著文抨击时政，遭学堂开除。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新任校长严复力荐，才重返北大学习。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京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后曾在北京担任《民国日报》主编，因参与刺杀载洋活动，受袁世凯通缉，被迫返回四川，以教书为生。叙谈中，他为孙炳文广博的学识所感染，他希望孙炳文能留在南溪，经常在一起摆谈。

对于朱德，孙炳文一改原来传说中的印象。他感到，朱德在言谈中显露出的谦逊态度和坦率、质朴的性格，与他那不平凡的军事经历，融汇成一种难以言表的独特风格，颇有儒将之风。他后来回到成都曾对李贞白说，朱德虽然是一武将，但并无使人难于接近的阴狠粗鲁，他是一个很高雅的人。

这一次见面，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临别时，他恳请孙炳文有机会再来叙谈，并请孙炳文代他向李贞白问候。

夏季的炎热提早来到倚临长江的南溪。军旅中的孤独生活，常常使他想起生活在仪陇家乡的祖母和两位母亲（生母和伯母）。尽管他与她们有通信往来，却也无法排遣心头的烦闷。也许是由于天气的缘故，或是由于生活孤寂的缘故，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他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环境，以摆脱目前令他困扰的境地。

这时，有人给他提起一门亲事，女方叫陈玉珍，毕业于南溪简易师范学校，是当地商人陈方洲的长女，也是孙炳文的外甥女。他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朱德见到了陈玉珍。他后来谈到她时说：“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一九一六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一向自矜的陈玉珍经过这次见面，对朱德也颇有好感。尽管这位性格内向的护国军团长（1917年4月召开的裁军会议后，入川滇军编为第六、七两师，朱德担任第七师第二十五团团团长）比她大10岁，她还是同意了俩人的婚事。

对于婚后的生活，朱德似乎感到十分满意。他后来回忆说：“她（陈玉珍）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他们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在那里看书和讨论读过的书籍。

然而，时日不长，从外界传来的一连串消息，打破了小家庭的那种安逸、恬静的气氛。

袁世凯死后，重新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但是，执掌国家权力的仍是那些争权夺利的军阀政客们。1917年，在是否参加欧洲战争的问题上，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发生争执。5月，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的职务。为此，段唆使安徽、奉天等8省军阀宣告“独立”，进行反黎活动。处境危险的黎元洪手中无兵，只好求助于驻徐州的军阀张勋。一向主张复辟王朝的张勋认为时机到了，便以调停为名带兵进京，继而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从故宫请出溥仪，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段祺瑞利用国人反对复辟的声势，率兵入京，赶跑张勋，结束了这幕复辟丑剧。黎元洪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副总统冯国璋代之。随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元勋自命，再次当了总理。但是，他又毁弃了《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为此，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推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唐、陆为元帅，揭起“护法”的旗号。唐继尧在云南随即组织靖国军，通电“护法”。同时电令在川滇军先平川乱，然后北伐。

这时，朱德被任命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他告别了陈玉珍，率部离开南溪，重新投入到战火的硝烟中。

四川素有“天府”之称，资源相当丰富，特别是盐，它给四川带来十分可观的收入。盐税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清王朝时就受到重视，每年除支付赔款外，还有1000多万元的余额。因此，北洋政府也很重视对四川的控制。唐继尧提出“思惟北征，宜先靖蜀”的方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图霸西南，首先就要掌握四川的统治权。正当川、滇、黔军力争夺四川军政大权混战时，北洋政府任命川军师长周道刚代理四川督军，又派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以四川查办使的名义率两个旅入川，企图置四川于北洋政府控制之下。

9月以后，川军刘存厚部向川南滇军发起猛攻。滇军师出无名，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至11月，被迫退走横江、叙永一线。滇军损失严重，不得不进行整编，朱德改任第二混成团团长。他看到官兵们衣衫单薄，情绪低落，补给无源，为此深感忧虑。

正当滇军在川南战场频频告急之际，重庆战场的胜利，使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2月初，滇军顾品珍部攻克重庆。吴光新败走鄂、湘。刘存厚担心两面受攻，命令所部从川南各地后撤。川南滇军乘势发起反攻。12月13日，朱德与金汉鼎、周印川等部向泸州攻击。战斗持续1天，刘存厚部全军溃败，滇军遂克复泸州。15日，川军熊克武部在川东树起“护法”旗帜，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推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1月，靖国军各部分头向成都进攻，刘存厚不支，被迫退入陕南地区。四川的战事至此结束，局势暂时恢复了平静。

这时，朱德以为川境平定，滇军可以撤出四川，进兵北伐了。他和金汉鼎等联名致电唐继尧，痛陈滇军自入川参战以来，“迭遭挫折，饷械损失甚

巨，军威扫地，为滇军从来所未有。”“川督一席，军民心理均属望于熊（克武）君，人心所归，如水就下，种种论断似无再战之必要。”他们在电文中要求部队休整补充后离开四川。然而，唐继尧图谋四川的目的尚未达到，严令他们仍留驻在四川。3月13日，朱德再次致电唐继尧，“现荆襄危殆，日甚一日。德收合余尽，士兵已得休息”，“恳俯允率所部出武汉，歼灭敌胁。”但是，朱德的努力是徒劳的，电文发出，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时的朱德还没有认清唐继尧的真实用心，以为自己仍在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护法”号召履行着职责。

3月间，滇军恢复原建制，朱德仍担任旅长。他率部进驻泸州，同时兼任泸州城防司令。

这时，使朱德感到兴奋的是，孙炳文意外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在分别的一年中，他曾多次给孙炳文写信，希望孙炳文能到他这里任职。当他得知孙炳文此行泸州不再离开，禁不住喜出望外，当即聘请孙炳文担任旅部咨谋。

从此，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两人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结为挚友。

---

朱德、金汉鼎致唐继尧电，1918年2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朱德致唐继尧电，1918年3月1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 五 五四运动前后

## 重返泸州

泸州，坐落在四川省南部长江与沧江的会津处。据传，三国时，诸葛亮看到这里地势险峻，又居于川、滇、黔3省要冲，就修筑了此城。

泸州地区的匪患渊源日久，随着局势的变化，时盛时衰。护国战争后，北洋军残留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结合在一起，裹挟了一批因战乱而生活无着的乡民，组成股匪到处滋扰乡民。他们打家劫舍，烧杀奸淫，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使四乡百姓不得安宁。在众多股匪中，崇仪乡匪首李得尤为有名。他原是北洋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北洋军退出四川后，他留在泸州，聚集散兵游勇，占山为王。百姓甚为恐惧，就连当地官府也对他无可奈何，而当地驻军又不愿插手干预。

朱德担任城防司令后，便担负起清剿土匪的任务。朱德准备率部下乡剿匪的消息传出后，百姓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都希望早日肃清匪患，使得四乡安宁。但也有人劝告朱德切不可大动干戈，说土匪剽悍、狡猾，时聚时散，聚时千把人，散时无踪影，游踪不定，难以制服，还是以安抚为好。朱德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身为地方防务长官，应该与民同乐，安良岂能纵暴，既然百姓有此要求，岂可等闲视之。他根据自己在云南剿匪的经验，非常有把握地对劝他的人说，土匪纵然凶狠、狡猾，我们还是想办法制服他们的。

5月间，朱德率部下乡剿匪。他派人在四乡贴出告示：“凡为匪者，只要缴械自首，改恶从良，则概不追究，免于惩处。家在外乡者，发给路费；家中困难者，发给安家费；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

当时，有一个绰号陈大眉毛的匪首，聚集了千余名匪众，势力与李得不相上下，而且颇有心计。朱德了解到陈大眉毛为人豪爽、仗义疏财，与其他匪首有不同之处，便派人做他的工作，晓以大义，规劝他弃恶从善，不再伤害百姓。经过几次接触，终于使陈大眉毛回心转意。他对匪众说：朱司令是仗义之士，我不愿意与他作对。人要讲血性，你们谁打算回家当老好的（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的意思），老子给大洋二元。要跟老子找出路的，就得听我的话，不能再干伤天害理的事体。”于是，当场有数百人表示愿意回家。不愿回家的，不久也跟着陈大眉毛离开了泸州地域。

在剿匪过程中，朱德制定的“歼首要，赦协从，缴械投诚者免死，仍给枪价”的政策，对分化瓦解股匪起到很大的作用，许多土匪纷纷缴械，表示愿意回家种田谋生。

从5月到9月，朱德率部在崇义、忠信、宜民等乡，先后将李得、戴步州、文安全等匪首捕杀。泸州地域的土匪降的降、跑的跑。匪患荡平，四乡百姓拍手称快，赞不绝口。忠信、宜民乡的百姓为感激朱德剿匪的功绩，分别将镌刻着“救民水火”、“除暴安良”的功德碑立在乡里。

回到泸州城，朱德脱下军装，穿起长袍马褂，利用战事的暂时平息，开始读书、做诗，并与当地文人学士一起切磋诗文，吟诗唱和。这时，他的妻子陈玉珍也搬到了泸州。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是消闲和安宁的。

早在朱德1916年驻军泸州时，他就与当地的文人学士相识往来，当时还

---

参见苏启元：《寿序》，《潘太夫人荣哀录》（未刊稿）。

《泸州市志》第二卷，《兵事》。



曾组织了一个“东华诗社”。1917年“护法”战争前，他从南溪回到泸州，又组织“振华诗社”。后因战事再起，他就没有再参加诗社的活动。在诗社同仁中，多是些有权势的官绅和有名望的先生，如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川南军政府副都督的温攸泉，泸县十大乡团练局长艾承休，乡团总熊仿文、胡乾初，做过前清知县的罗小吟，以及万慎、李射圃、艾熙、莫象贤等数十人。他们中擅长诗文的并不多，多数是为了附庸风雅、借以消遣而已。

孙炳文向朱德推荐他的老师朱青长，说他擅长诗词，功底颇深，可邀来讲学。朱德十分高兴，立即请孙炳文备齐礼物，前往江安拜望朱青长。

朱青长，字督臣，南溪人，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光绪壬寅科举人，尤擅词学。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从不为恶势力而折腰。慈禧太后60寿辰时，他奉召入京作联，深得慈禧赏识，拟授以官职，但他不为官所动，借故离京回到故里，继续过着他那清苦、宁静的隐居生活。民国初年，曾应朋友之邀赴京任清史馆顾问。由于他秉性温和，平易近人，又惜才如命，因而深得周围学子的敬重。他的弟子遍布川南地区的军、政、学各界。

朱青长一到泸州，就受到朱德的欢迎。同时，朱德把朱青长又介绍给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参谋长杨森等人。赵又新邀朱青长入幕，任第二军军部咨议。不久，朱德、赵又新、杨森等即拜朱青长为师，请朱青长讲授诗词。

泸州的10月，正逢金秋时节，气爽天高，素有“酒城”美称的泸州飘溢着令人陶醉的酒香。这里出产的“泸州老窖”闻名于世，在世界博览会上荣获巴拿马国际金奖。

一天，朱德宴请三泸各界人士，意在联络感情。温攸泉、刘泽意也搬来“温永盛”、“爱人堂”的老窖大曲和花果酒助兴。

席间，朱德提议，为继承泸州盛行诗词的文化传统，恢复诗社的活动，以诗言志，以诗会友。同时，他还希望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帮助解决驻军的粮饷。他的提议，当即得到在座人士的响应。众人推举朱青长为诗社命名。朱青长因清末在泸结社，名“怡园诗社”，故提议沿袭原名，得到一致赞成。随后，有人表示愿意提供粮食，也有人表示捐钱捐物的。

这时，有人提议朱德应为恢复诗社活动写几句。于是，朱德将前一年他为东华诗社成立写的序抄录了下来：

岷江沱水，兴波逐浪韶华；小市兰田，兵火烽烟劫里。横渠赋诗，大块假吾挤以文章，倚马唱酬，时局开我辈之襟抱。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忙里偷闲。惧（距）一百六日，战守疏虞，负二四翻风，唱酬寄兴。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但消吟债，不效摘句寻章；得满诗囊，何必寻花弄月。虽孟浪而苏豪亦称尔雅，纵元轻而白俗岂乏风流。爱借他山，共成吟社，极功错切磋之力，收气求应吹之功。大力宣传，振兴东亚中华，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

众人看罢，交口称赞。

朱德对于诗词的爱好，不亚于临摹碑帖。常在“治军之暇，召邑人士以古近体诗相切磋，于是月常十数见，见必言诗”。当然，他对于诗词的理解，侧重于“诗以言志”，而不是刻意追求诗句的齐整。在这期间，他写下了不少诗篇，借以抒发他的思想情怀。

---

泸县文教局：《朱德在泸县》。

陈铸：《寿言》，《潘太夫人荣哀录》（未刊稿）

他在回忆辛亥革命的辉煌业绩的同时，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

传遍军书雁字斜，誓拼铁血铸中华。

悲秋客忆重阳节，起义师乘八月槎。

燕池荡平鞭索虏，神州开辟种黄花。

秋光未尽烽烟尽，鼓角声中半是笳。

他愤怒地谴责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恶行径，同时表达了护国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心情。

筹安客意住龙头，惊起神州肃杀秋。

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

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

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废朝班。

他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争权夺利，割据称雄的大小军阀们的罪行，并给予辛辣地嘲讽。

伟人心事在争城，扰攘频年动汉旌。

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

欣闻外地同时靖，默祝中原早日清。

独抱杞忧安社稷，矢心为国睹升平。

汹汹天下尽为烽，八载衅开百二重。

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

中央老朽能谁主，各省英雄岂自供。

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

年年争斗逼人来，江山如此万姓哀。

冯妇知羞甘守节，徐娘无耻乱登台。

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

西蜀偏安庸者据，中原逐鹿是雄材。

他充满深情地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和不畏强暴，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强决心。

博得勋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透迤。

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陲。

信有霜寒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

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在他的诗中，也有怀念故友，倾诉自己苦闷心境的情感流露。

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

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

为国无时还梓里，戎衣何日换金貂。

买山筑屋开诗社，幸赋归来避市朝。

朱德对唐人杜甫的诗篇十分欣赏，杜诗风格沉郁、情感深重，而且语言精练，其中不少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而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却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些恰恰符合他的心境。因此，他也时常借用杜诗的韵脚作诗。

---

载 1978 年第 8 期《人民文学》。

载 1978 年第 8 期《人民文学》。

载 1978 年第 8 期《人民文学》。

朱德在泸州期间，除了和诗友们吟诗唱对之外，更多的时间则用来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典籍。

他在阅读《史记》、《三国志》时，写下许多眉批，表明他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在政治与军事、品格与志向方面的基本看法。

当他读到《史记·秦本纪》中秦穆公为扩充疆土，对百里奚等人的劝阻置之不理，远袭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国军队打败一段时，在上面批道：“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项梁在击败秦军后，沉溺于骄色之中，听不进宋义的劝告，结果，终于为秦军战败而死。他批道：“骄兵必败。”

他对孙权中原兵败，返回江东建立根据地，图谋发展的决策，甚为赞赏，批道：“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而对刘备自举兵后，一直走州串府、疲于奔命，到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才夺取益州（即成都），占领汉中，建立蜀汉政权一事，则批道：“此时方得根据地，可为差矣。”

他认为，曹操用人是“尚才不尚德，乱平而人心丧尽”。而对曹操在芍陂屯兵垦田、以兵养兵的远见卓识，却加以肯定，认为这是“留薪办法”。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王勾践的近臣范蠡功成名就之后，却弃官而去。他在上面批道：“范蠡，千古奇人也，能弃功名富贵，而功名富贵常随也。世之急急名利者反以杀身，而不知效范蠡为人也。”

从历史书籍对历代社会政治兴衰更替、成败得失的记载中，朱德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1939年，他在同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交谈时说：“从《三国志》中，我得到了很多打仗的好经验。”

朱德在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然而，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却使他感到十分失望，封建的政治、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国家实现了统一。但实际上，军阀间的相互争斗使国家仍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黎民百姓在战乱的频扰下，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现实，他“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出路”。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新时代书店1939年版。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 苦闷·彷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英、美、法、意、日操纵下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正当要求。4月下旬，和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不顾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霸占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种强权主义的做法，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后，首先在知识界和学生中激起极大愤慨。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3000余人举行集会、游行，提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震动了全国，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热烈响应。

在泸州，各校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举行罢课、游行、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学生们这一爱国行动，很快影响到工、商各界，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泸州轰轰烈烈地展开。

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着中华大地，也激励着朱德。作为一名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意识驱使他在这蓬勃兴起的浪潮中去寻求拯救中华民族的出路。

1920年1月初的一天，泸县中学的校长找到朱德，请他给学生们作一次演讲。朱德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

第二天上午，他如约来到泸县中学。因校方已于前一天挂牌通知了全校学生，所以，礼堂里早已挤满了人。有的人没有座位，就站在通道上聆听着朱旅长的演讲。

“……抵制日货，固然是爱国之举。但是，仅仅是抵制还不是根本的办法，还要提倡国货。依本人之见，办法有两个：一是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销售我们自己的东西；二是开办自己的工厂，生产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能够普及国货，日货自然就可以抵制了！”

朱德的演讲博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大家一致赞同朱旅长的爱国倡议，并称赞朱德热心公益事业，提倡平民政策，不愧是军界的出色人物。

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开始涌入泸州。朱德和孙炳文常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各种问题。他开始把目光集中到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上。

当时，对他产生影响的进步刊物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仅仅是从别人的文章中得来的，还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但是，对于处在当时那种生活环境里的朱德来说，犹如走进了一个新天地。

这期间，他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中，看到了李大钊、陈独秀和一些自称无政府主义的学者写的文章。这些文章为朱德提供了一个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产制度的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劳动，没有好吃懒做之徒，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从这些文章中，朱德还了解到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广大劳动群众摆脱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当家做了主人。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地体会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

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他和孙炳文一起，讨论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为什么屡遭挫折等问题。虽然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但毛病到底出在哪里，他们却陷入了困惑之中。他和孙炳文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的思索、讨论，结论是各种各样的，却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如此，他们仍在不知疲倦地努力探求着中国的出路和自己的前途。

这时，朱德广泛阅读了各种书刊，互不相容的各种思潮、学说都对他产生着影响。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他曾通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有所了解。他和孙炳文等人反复地讨论着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思想”。<sup>1</sup>所以，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独立国家，他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sup>2</sup>

这一时期，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朱德来说，他的内心是复杂的，既有对未来的向往，又有对现实的失望，既在为改造中国社会进行艰难的探索，又为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感到彷徨，他深深地陷入了苦闷之中。

---

<sup>1</sup>《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5、386 页。

<sup>2</sup>《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50、145 页。

<sup>3</sup>《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77、150 页。

## 在封建泥沼中挣扎

时光流逝，不觉已两年过去了。朱德作为少将旅长（此时已改称第三混成旅）率部驻扎在泸州。就物质生活来说，他是富足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来到这位农家子弟的身边。这时，他不仅偿还了仪陇家中的所有债务，还为家人在马鞍场柏林嘴修建了一处宽敞的宅院。1919年秋，他派人将全家20多口人接到了泸州居住。对于年至花甲的父母，他努力尽自己的至孝之心。他还把两个弟弟：朱炳、朱 ，送进第二军随营学校，朱德希望他们也能像他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人。

然而，丰厚的物质生活却无法改变他在精神上的苦恼。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努力寻找着出路却又找不到出路，他希望摆脱军阀间争权夺利的涡流，却又无力自拔。1937年，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时写道：“谈到他在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抽鸦片在那时候的军官之中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朱德在此之前，不曾有这一嗜好。现在，他卧在鸦片烟榻上，身边放着烟枪和烟灯，一边抽烟，一边和他的朋友、参议孙炳文聊天。孙炳文试图劝说朱德戒烟，但未成功。他告诉孙炳文说，他愿意把烟戒掉，到国外去给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也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他不停地谈论，不停地抽烟，避免和家人见面，也不关心他的军务。”他渐渐地消瘦了。

这一年年底，一件更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朱炳和朱 在一次作战中双双阵亡。消息传来，全家人接连数日不思茶饭，沉浸在悲痛之中。原本就不愿让朱炳、朱 当兵的父母，这时更加悲伤。他们不想留在泸州，执意要回仪陇老家。由于朱德再三挽留，他们勉强答应再留住一段时间。

对朱炳、朱 的死，他感到悲哀、内疚，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年迈的父母。他在祭奠朱炳、朱 的挽联上写道：“埋玉树著土中，拼热血把帝制消沉，大功回首亡双弟。奋金戈于海火，抱正义而为民请命，奔苦伤心剩一兄。”

1920年，战事频频的四川又掀起了新的波澜。

初春，唐继尧以四川督军熊克武阻挠北伐为名，联合与熊克武有矛盾的吕超、杨庶堪等，再次在四川挑起战火，朱德也被卷进这场混战中。

唐、熊之间的矛盾，早于1918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川、滇、黔3省联军会议上就已产生。在会上，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借用北伐的名义，提出一个由联军总司令部掌管四川兵工厂和厘税的“准备北伐案”。唐的方案，自然遭到了川军的反对。与会者都明白掌握了兵工厂和厘税，实际上就掌握了四川的政治、经济的命脉。四川督军熊克武软硬兼施，把唐的方案顶了回去，致使唐的目的没有达到，一气之下回到云南。但是，唐企图兼并四川的野心并未放弃。

战争从5月下旬持续到7月，熊克武兵败成都，退位间中、保宁一带集结，伺机反攻。赶走了熊克武，朱德自认为可以出兵北伐了。于是，他向川、滇、黔诸将领发出通电，呼吁尽早出兵北伐。他在电文中写道：“吾济为出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2页。

陶体贵：《沛云堂立雪杂录》。

兵（北伐）而战，为熊氏障碍出兵而战。今熊氏既去，障碍即随之消失……若出兵之事迁延，而目的与心肝各有在，则不仁转属义师，讨叛即为国贼……天下其谓我何？”不久，他再电川、滇、黔诸将领，呼吁“誓师江干，秣马关陇，能出者是，不出者非也；一瞬千金，时不易得，急行者是，犹豫者非也”。<sup>1</sup>尽管朱德的通电，得到川、滇、黔一些将领的赞同，但唐继尧却置之不理，仍令顾品珍、赵又新继续留在四川，完成“靖川”任务。

8月初，朱德率部进入成都。在这里，他遇到了年初来此担任四川造币厂厂长的孙炳文。他向孙炳文倾诉了自己心中的苦闷，孙炳文向朱德表示，他打算“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告诉朱德，他的妻子任锐和李大钊是北洋法政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他们在导师白雅雨的引导下，加入了“京津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朱德也表示尽早摆脱目前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在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之前，应当先到外国去学习，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他们约定，孙炳文先行北京，朱德则在料理完军中事务后，即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

8月下旬，四川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唐继尧在驱逐熊克武之后重提四川兵工厂和厘税的旧案，引起川军将领的极大不满。熊克武趁机提出“川人治川，驱逐客军”的口号，联合川军各部，通电驱逐滇、黔军。9月上旬，川军与滇军在成都近郊龙泉驿展开激战。结果，滇军大败，被迫退往川南，朱德率领的第三混成旅损失严重，只剩下1个团的兵员。

滇军的失利，更加深了滇军诸将领对唐继尧的不满情绪，无心再为唐继尧卖命打仗。面对这人心涣散的局面，连一向支持唐继尧吞并四川的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也无可奈何，他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写道：“驻川滇军，苦战日久，兵士则思归念切，将领则受新潮流感动，均不愿再作无谓之重大牺牲。”

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对唐继尧素有积怨，在“倒熊”战争之初，熊克武与他在简阳石经寺晤谈时，即密商返滇倒唐事宜。这时，他已决定返回云南，驱逐唐继尧。然而，此时的唐继尧仍在梦想夺回在四川失去的利益，他致电顾、赵等人，希望他们坚持下去，撑持目前滇军所面临的危局。

10月上旬，川军各部云集川南，向滇军发起猛攻。驻守在泸州的赵又新没有料到他的参谋长杨森已经反水，投向川军。他在逃离泸州时，被杨森部下击毙。下旬，滇军一败再败，被迫放弃川南地区，退入贵州境内。11月，滇军撤回云南，朱德率部驻扎在滇北昭通地区。在川军到达泸州前，他的家人已离开泸州返乡，他的父亲朱世林病死在途中。

滇军回到云南后，顾品珍等积极策划“倒唐”，朱德对此表示赞成。同时，留在省内的滇军将领叶荃、邓泰中等也表示倒戈反唐。1921年2月6日，朱德等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为大局计，为西南计，为吾滇计，为公自身计，实有不能不请我公暂避贤路”，逼迫唐继尧离开云南。唐继尧见大势已去，于2月7日离开昆明，不久即去了香港。8日，朱德等部进入昆明。

倒唐的目标既已实现，朱德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提出了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他的同事和朋友们纷纷登门相劝，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共同整

---

邓锡侯：《一九二一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45页。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78页。

朱德等致唐继尧电，1921年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治云南。最后，他同意暂时留下，为新政权的建设尽力。是月，滇军进行整编时，朱德被任命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不久，又兼任了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帐项委员长。任职期间，他尽忠职守，彻底清理官僚和奸商拖欠铁路局的借款，惩治贪官污吏，为新政权的建设努力工作。

然而，云南的现实越来越使朱德感到失望，他对新政权是否能挽救战乱纷争的国家产生了怀疑。更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心胸狭窄的顾品珍掌权后，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丝毫不恭的表示，即使是学生们暑期组织演出队，宣传新思潮的活动，也被他横加禁止。于是，朱德下决心要离开云南。他找到一位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教师，向她学习英语，开始为将来出国作准备。



## 决裂

1922年元旦刚过，朱德即接到新的委任，他被任命为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新的职务对于当时的朱德来说，是符合他的意愿的。经历了多年的战争，他希望自己离开军队，特别是在他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之后，认定“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是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时，他产生了“军人生涯不是他所应走的道路”的思想。

2月的昆明城，已呈现出浓春的景象，花红草绿，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这时，坐落在金马山麓的昙华寺里，游人、香客，络绎不绝，为偏僻的山野增添了几分热闹的气息。昙华寺，又名昙花寺，因寺中种有一株年代久远的优昙树而得名。朱德回到昆明后，时常和朋友们来这里观花赏木，因而与寺中住持映空和尚相识。

是月，朱德再次来到昙华寺，写就了一篇诗文送给映空和尚，映空请人将诗文刻在石碑上，置于殿内，以志纪念。朱德在诗文中写道：

敬赠映空大和尚雅鉴：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谁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万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询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觐。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我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

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

朱德在诗文的前半部分记录了自己10年军旅生活的经历，也记录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负，因而，不难看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是贯穿于他的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在诗文的后半部分，他通过对遁入佛门的映空和尚的生活描述，抒发了自己对时局的感慨，也流露出苦闷、仿徨的心境。尽管如此，面对着黑暗、腐败的社会氛围，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光明未来的追求，为冲破封建主义的罗网进行着坚韧的抗争。

3月间，云南的政局再次出现了动荡。

一直图谋重霸云南的唐继尧利用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准备北伐的机会，在广西纠集旧部，并收买了吴学显、莫卜等云南一些土匪，向云南境内发起攻击。率部行至宜良的云南北伐军总司令顾品珍仓促应战。由于判断失误，战略上处于被动，使部队形同散沙，只能各自为战。3月6日，土匪吴学显部偷袭在宜良的北伐军总司令部，顾品珍身边仅有1个警卫营，无法阻止大批土匪的进攻，最后自杀身亡。北伐军各部也随之退走广西。

这时，昆明城流言沸扬，风声越来越紧。滇军代理总司令金汉鼎与朱德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页。

碑文现存云南昆明市昙华寺内。

等人议定，先到缅甸，再作计议。行前，朱德将小梅园巷的房产及藏书赠予李云鹤，并嘱托李帮助照管他的家眷。

朱德和金汉鼎、刘云峰、唐淮源等带着两连人马离开昆明后，在安宁遇到罗佩金，罗劝他们到楚雄暂避几天，而后再到缅甸去。谁料，当他们行至广通时，驻楚雄的华封歌突然改变态度，无意容留他们。在朱德的建议下，这支逃亡的队伍又转向盐丰方向，准备渡过金沙江，到四川去寻找出路。

几天里，他们一直在高山深谷中风餐露宿，疲于奔命，总算摆脱了唐继尧部队的追击。当他们来到金沙江畔时，突然受到当地土匪的袭击，刘云峰被劫，朱德等渡过金沙江后，所部百余人仅剩下五六十人。

朱德一行人刚渡过江，余悸未消，又有卫兵跑来报告，说前方出现一队人马。是喜？是忧？朱德已顾不上考虑，提起枪冲了过去。

来人全是彝人的装扮，见面后即说起哥老会的“行话”。朱德听罢，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他曾加入哥老会，懂得其中的暗语和规矩，所以，对答如流，应付自如，使一时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经过了解，朱德才知道这里是土匪雷云飞的地盘。

雷云飞原是此地的贫苦农民，因无法忍受地主的欺侮，跑进山里做了土匪，他在这一带打富济贫，从不伤害百姓，因此，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戴。朱德后来谈到他与雷云飞交往的情况时说：雷云飞是一个短小精悍、30多岁的汉子，不识字，精力充沛，有领导和组织才能，到1922年，他的队伍已有5000人。他的确是一个土匪，每逢没有收成或收成不好时，他就打进富裕的城市，劫富济贫，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动乱中，他看到或听到许多奇怪的事情，不少人逃到他那里避难，他则保护他们。他尽力模仿民间故事里那些赫赫有名、为人崇拜的土匪头子，我们交了朋友，促膝畅谈中国现状，他是一个理解力很强的人，问了我许多问题，并希望我留在那里，为他出谋划策。我说明留学外国的决心，他听了很为惆怅。临别时，我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自动手枪和高头大马送给了他，并把妻子在南溪的地址告诉了他，邀请他外出或是避难时，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他策马送了好几里路，又派人护卫我们一直到离会理一里地的地方。其后几个月，我到了上海，接到妻子的信，提及雷云飞曾派人到南溪，送还我的马匹，并探问我平安否。后来，我到了德国，妻子写信给我说，雷云飞到过南溪一次，打算劝我同他一道到他那里去，听说我已出国，懊悔不已。过了1年，我看到国内报纸说，他已经被四川军阀刘湘的侄子打死，他控制的地区也被侵占了，我难过了很久。

朱德一行人告别了雷云飞之后，到达会理，受到县长赖建侯的款待。而后穿越大小相岭，经雅安、乐山、叙府，于5月中旬抵达南溪。

这一次逃亡，对朱德来说，也许是一生中最悲惨的事情。他一路奔波，既要防备突然出现的袭扰，又要忍受戒烟的痛苦，他把戒烟称作“一场很艰难的战斗”。然而，这一次逃亡又成为他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他后来回忆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从此，他可以毫无牵挂地去寻找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回到南溪，朱德打算休息几天即顺江东下，从上海转往北京去找孙炳文。谁料想，他突然接到杨森的来信，邀请他到重庆“叙旧”，他不清楚杨森为

---

参见《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9—160页。

《朱德将军传》，第61页。

什么会约他去重庆。他和金汉鼎商议后，还是决定应邀前往，否则的话，他和他的家人的生命都有可能受到威胁。

5月下旬，朱德和金汉鼎乘船来到重庆，受到杨森的热情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与仪陇同属顺庆府治辖）人，早年也曾在顺庆府中学堂读书。1913年离开川军投奔滇军，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护国讨袁时任中校参谋，随第二梯团赵又新入川。后担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与朱德一起共事。1920年，川、滇军战事再起，他被派至隆昌，随即率部反水，转投川军。滇军兵败泸州时，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就死在他的部属的乱枪之下。他和朱德共事多年，素有交情，他曾因输光军饷，得到过朱德的资助，而且深谙朱德的才干。

这时，他刚刚接任刘湘的川军第二军军长一职，踌躇满志，欲与其他四川军阀争雄四川，以实现他统治全川的野心。所以，他对朱德和金汉鼎的到来，甚感高兴，以为能有他们的倾力相助，定会早日成其大业。

连日里，杨森和刚卸职的川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刘湘，亲自陪同朱德、金汉鼎观看端阳“龙舟竞渡”，游览名胜古迹。他们对朱德殷情相待，唯恐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但是，结果却出乎杨森的意料之外。当杨森向朱德提出委以师长一职时，朱德婉言谢绝了杨森的要求，他告诉杨森，他已决定出国学习军事。杨森极力挽留，也无济于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之后，重回四川，他一定虚席以待。金汉鼎也婉言谢绝了杨森的要求。

江轮缓缓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向上海驶去。朱德站在甲板上，感到特别的轻松，内心充满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喜悦……

## 六 远涉重洋寻正道

## 找党

江轮驶出三峡，经汉口、九江、南京到达上海。

朱德避开繁华都市的喧嚣，住进了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他凭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经历了数日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摆脱了鸦片给他带来的苦痛。当他精神焕发地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刻，他感到如释重负，异常的轻松。他在朋友家住了几天，便迫不及待地登上北去的列车。

途经南京，朱德顺路去探望他的老师、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鸿祥。

李鸿祥，字仪廷，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云南新军七十三标管带，兼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辛亥革命后，曾任师长，云南省民政长（相当于省长），后赴广州。他与朱德有师生情谊。

金陵重逢，师生之间倍感亲切。朱德向李鸿祥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并且表示了要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深得李鸿祥的赞赏。临别前，李鸿祥取出两千元广东毫洋，送给朱德作为旅资。朱德也回赠李鸿祥一尊乌铜马留作纪念。35年后，朱德重返昆明时，再次与李鸿祥相见，这时，两人都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兴奋之余，朱德即席挥毫题诗两首：

忆昔重阳大义伸，而今始得告功成。  
英法势力杏然去，且喜国防有善邻。  
英侵法略视眈眈，革命当年秘密谈。  
制度更新歌乐土，彩云永是现滨南。  
为表达感激之情，李鸿祥也奉和三首：  
青山一发是滇南，白首相逢慷慨谈。  
论道经邦动天地，春醪共醉乐眈眈。  
一别金陵三十春，谁知华发又增新。  
若非怀抱真豪杰，瀛海风光肯借人。  
百战长征身健在，艰难缔造作新民。  
河山统一空前古，哪怕渔人来问津。

7月初，朱德来到北京，他在前门火车站雇了辆人力车，找到宣武门（旧称顺治门）外的方壶斋胡同。

朱德的到来，使孙炳文欣喜万分，赶紧将朱德让进屋里。寒暄过后，他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 介绍给朱德。

第二天，朱德随孙炳文和黄志 到前门外的煤市街浴池洗过澡，便进了正阳门，在城里闲逛起来。

古老的紫禁城，随着清王朝的覆没已失去了昔日富丽堂皇的景象，琉璃瓦屋顶上荒草丛生，更衬托出今朝的凄凉。孙炳文告诉朱德，如今里面还住着清朝的宣统皇帝，过着与外世隔绝的生活。

在街头，朱德看到行人中还有头戴顶子，身着长袍马褂的清朝遗老遗少，虽然往日的威凤已消失殆尽，但仍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样。

孙炳文向朱德介绍了北京的现状，特别提到了北京政府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控制下，中国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朱德后来回忆说：北京政府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

坑，旧武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几天后，在黄志 的邀请下，孙炳文陪同朱德乘上北去的火车，前往宣化。车过居庸关，朱德在这里看到了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它解决了火车在山岭中爬坡的难题，可以说，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大创举。车到下花园，他们又换乘汽车来到鸡鸣山煤矿，黄志 就在这里工作。黄志 向朱德介绍说，这个煤矿的规模虽然比不上英国资本的汉冶萍煤矿，但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在矿井里，朱德看到，在昏暗的光线下，面色黝黑、浑身挂满煤屑的矿工佝偻着身子，步履艰难地把一筐筐煤背出矿井。如同当年他在南部县看到的盐工一样悲惨。

离开鸡鸣山，朱德和孙炳文又继续北行，先后到了绥远的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山西的大同，参观了王昭君墓和云岗石窟。塞外荒凉的大漠和贫穷的百姓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路上，孙炳文告诉朱德，铁路、煤矿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压迫，闹起了工潮，要求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不愿再做牛马。工潮的声势越来越大，军阀和外国资本家感到十分恐慌。孙炳文还告诉朱德，他的朋友李大钊参与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孙炳文的话引起了朱德的浓厚兴趣，他希望孙炳文能介绍他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会面。

回到北京，朱德又去拜望了担任航空督办的李根源，李根源很赞同朱德出国留学的打算，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出国的护照。这时，孙炳文告诉朱德，李大钊正好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陈独秀已到了上海。于是，他们决定动身去上海找陈独秀。

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上海。恰好金汉鼎也到了上海。金汉鼎对朱德说，孙中山最近从广州来到上海，很想见一见滇军的将领。不久，朱德在法租界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德后来回忆说。

这时，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乱，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正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他打算借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因此，希望朱德等能够重返滇军，助他一臂之力；并且表示他可以先付10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金汉鼎当即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朱德对孙中山先生的处境深表同情。然而，经历了多年军阀战争的朱德却不愿再陷入军阀战争的泥潭中，而且，他对孙中山先生利用军阀打军阀的做法也已失去了信心。他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于是和孙炳文委婉地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说他们已经决定到欧洲去留学，考察战后欧洲的状况。孙中山见劝说无效，只好作罢。临别前，孙中山握着朱德的手说道：“革命的前程远大，各人的志向也有大小之分，好自为之吧。”

8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和孙炳文来到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在一幢陈旧的房屋里，他们见到了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朱德以为，只要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2页。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2页。

(3)《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2—173页。

陈鑫：《随朱德委员长谒见孙中山的回忆》。

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然而，见面后的谈话使他大失所望。他坦诚地向陈独秀陈述了自己的经历，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陈独秀冷漠地回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告诉朱德，“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sup>1</sup>。

他历尽艰辛，刚刚叩开准备踏进去的大门，然而，大门却砰的关上了。他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在绝望中，朱德并没有放弃他追求真理的信念，他和孙炳文商定，按照原来的计划，到欧洲去，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

<sup>1</sup>《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75 页。

## 到马克思的故乡去

1922年9月初，朱德登上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开始了海上的长途旅行。他第一次换上西服革履，颇有些不自然。可以想见，在当时，穿惯了戎装和中式长衫的朱德，乍一换上洋人的衣装，也许在观念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轮船行驶在海上，水天一线，一望无垠。海鸥伴随着轮船，无忧无虑地嬉戏、追逐着……

大海，对于朱德来说，是陌生的、神秘的，在大山里生长的他，只见到过家乡的小河、嘉陵江，以及长江，但这些江河同大海比较起来，就显得那么渺小。

这次与朱德同船的除孙炳文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10多人，其中大多来自四川，也有安徽、福建等省的。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社会、政治观点不同，去欧洲的目的也不同。这时，朱德已是36岁，在同行人中，他和孙炳文年龄最大。

邮轮经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非洲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西西里海峡。轮船行驶的速度很慢，并且每到一处都要停泊一两天，有时三四天。朱德对此倒感到很惬意，他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光沿途国家的风土人情。

一路上，朱德所见到的竟与他想象中的外国大相径庭。在南洋一带，并非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捞钞票”的世界，许多从国内来这里寻求生活出路的人连安身的处所都没有，从他们那憔悴、疲惫的神态中，可以看出这些人依然过着穷困不堪的日子。大街两旁，洋房、花园与破屋陋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非洲，黑人们的艰难生活更使他感到惊讶。目睹这一幕幕惨状，他深有感触，“看来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

邮轮经过40多天的航行，最后到达目的地——法国马赛港。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们就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残破不堪的景象，沿街可以看到不少衣衫破旧的乞丐在向行人乞讨。这与他在国内想象中的巴黎完全是不同的。战争的创伤依然笼罩着这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

在巴黎，朱德也看到，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凯旋门虽然已是斑驳陆离，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却依然显得宏伟壮观。凯旋门上的图案，记录着它那光彩夺目的历史。当他登上高矗入云的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巴黎城虽然经历了战火的摧残，却依然可以显出当年富丽堂皇的景观。美丽、宁静的塞纳河以及坐落在河畔的巴黎圣母院，都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那个商人年轻时就漂洋过海，来到法国谋生。他依然眷恋着自己的故土，因此，一有空就请朱德他们介绍国内发生的事情。有时，他也将一些巴黎的见闻说给朱德他们听。一天，他告诉朱德，听说一些到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闹起了革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在哪里，那个商人无法向他提供更多的情况，但答应帮助他们继续打听。



第二天，商人就把朱德和孙炳文带到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那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同时，那人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址写给朱德。这一情况，对于朱德来说，的确是太重要了，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和孙炳文决定，立即乘火车前往柏林。

这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宣传委员的周恩来，正在柏林考察德国劳工运动状况，而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留德学生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

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址。当他们叩开房门的时候，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朱德说明了来意，那个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吗？”周恩来望着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亲切地问道。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我叫朱德，字玉阶。”朱德自我介绍着，又指着孙炳文说“他叫孙炳文，字明。”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样年龄的。

寒暄之后，谈话即转入正题。朱德向周恩来叙述了自己寻求革命道路的经历：他是如何弃教从军，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如何离开云南寻找共产党，又被陈独秀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

周恩来细心地倾听着朱德的谈话，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他被朱德不寻常的经历和执著的追求精神感动了。

而后，他们就有关国内外形势、各种新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周恩来向朱德和孙炳文表示，他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收他们为候补党员。

这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他按照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的确，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他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

## 在德国

刚到德国时，朱德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上的障碍，既不能直接与当地人交谈，也不能阅读德文书籍，而当时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所以，他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德文和德语会话上。当时，他已有36岁，要重新学习一门外语，没有百倍的信心，并付出十倍的努力，又谈何容易。

朱德的学习方式很独特。不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死啃书本。他买了一张柏林市区图，先用中文注明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天都带上它出去走一走。他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个月里，他几乎走遍了柏林的每一个角落。沿途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或是允许他进去的工厂，他都要去浏览一番。他参观教堂、游览公园、访问议会和普通人家，还去听音乐会、看歌剧。有时他还和同伴们骑自行车到郊外去旅行。柏林的具有欧洲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形态各异的街头雕塑，宏伟壮观的大教堂、皇家歌剧院，风光旖旎的森林公园……，这一切，使朱德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然后在脑筋里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

读书自然要比会话困难更多一些，但他借助辞典，刻苦地钻研着。

在柏林期间，给朱德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他后来谈到：“当我对柏林了若指掌，并着手访问其他城市和工厂之后，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我记得有一次在卡塞尔住了一个星期，看了从铸铁一直到火车头制成出厂在铁轨上行驶，所得到的印象比我在德国参观所有文化机构时都要深。”

1923年5月4日，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下萨克森州的哥廷根。

哥廷根，位于德国中部的莱纳河畔。当时它是一座人口不足10万的小城。虽然它在德国的诸多城市中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然而，由于1737年汉诺威选帝侯盖奥格·奥古斯特在这里创办的大学曾经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学者，使这个小城闻名于世。法国的拿破仑曾赞誉这所大学“不仅属于汉诺威，而且属于全世界”。

朱德和孙炳文的到来，受到哥廷根中国留德学生会的欢迎。会长魏嗣奎因为与朱德他们是四川同乡，所以，更显得亲切、热情。此后，他在魏嗣奎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德文。他找来一本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ABC》（德文版），一边学习德文，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在他看过的书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注解，朋友们开玩笑说他“简直要把这本书给吃掉了”。

在哥廷根时，朱德住在文德路88号。房屋的主人是一位曾在军队中担任

---

《朱德自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1—182页。

过将军的男爵。他请这位男爵为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法。同时，他还买了不少有关军事的书籍，其中有一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星期三召开一次学习讨论会，这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这时，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增加了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 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此外，还学习《向导》、《国际通讯》上刊登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讨论的范围主要是一些理论问题和有关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通过学习和讨论，拓宽了朱德的政治眼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他终于“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1924年3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专业。他虽然每天都去听课，但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更使他感兴趣的还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在留学生会内。朱德在哥廷根担任过留学生会的负责人，他为人谦和，善于团结留学生一同进行活动，因此，大家都很敬重他。

在哥廷根期间，他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中国留学生会有一幢楼房，是1923年10月马克急剧贬值时用很少美元买下的。到了1924年，德国经济开始回升，马克币值恢复到战前水平。因此，原房主认为吃了亏，便向法院起诉，要求赎回楼房。对此，在中国留学生会里引起了一场争论。不少人认为，房子是双方自愿买卖的，合情合理，不能退给原房主。朱德却认为，德国政府把战争赔款的负担转嫁给德国人民，使德国人民蒙受了战争之苦。我们应该站在德国人民一边，同情他们的疾苦。在朱德的劝说下，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赞成把房屋无代价地退还原房主。开庭那天，朱德代表中国留学生宣布把房屋无代价地退还原主。中国留学生的这一举动，不仅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而且在几万人口的哥廷根被传为佳话。

这一年暑期，北大教授、共产党员陈启修来到德国讲学。朱德向陈启修表示要去苏联学习军事，得到了陈启修的支持。陈启修告诉他，如果能够得到中共旅莫支部执委会批准的话，一定同他一道去苏联。然而，朱德接连几次提出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12月，陈启修离德前，朱德又一次提出申请，结果仍然使他感到失望。

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大会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建议，实行国共合作。

1924年12月下旬，朱德在哥廷根市政局办理了移民手续，乘火车回到了柏林。他被中共旅德支部派往国民党驻德支部，专门从事党务工作。

1925年1月3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他的主要活动仍在留德学生会里。

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以冯自由、邹鲁、张继为首的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间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学生中。在留德学生

会里分成了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这时，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向留德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政策，团结留德学生会中的左派学生，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作斗争。朱德后来回忆说：“在柏林的许多有钱的中国学生，非但不参加新建立的国民党支部，反而组织了一个青年党，和我们敌对。他们甚至在德国的保皇党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里寻找盟友，还要求德国警察来迫害我们的组织和我手创的中文小报。”

在同右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日子里，朱德常常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组稿、印报到邮寄，什么样的工作都做，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报的工作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赴苏联学习军事的努力。3月7日，他在给从德国到达苏联的李季、陈启修的信中写道：“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此事可能否），即来莫人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即陈启修——引者注）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拒……似此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

朱德的信，言辞坦诚，信念坚定，它标志着朱德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当初在救国救民思想影响下，他立志做一名军人，为拯救中华民族冲锋陷阵。然而，当他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刻，他又希望早日脱离军队，出洋留学。只有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时，他才重新认识了自己，毅然选择了“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道路。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终年60岁。噩耗传到柏林，朱德万分悲痛。他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的名义组织追悼会、总理事迹报告会、纪念会，以寄托对“一个卓越的不屈不挠的不断进步的革命家”的哀思。在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他结识了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的一个贫寒家庭。1919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孙中山在南方创建的国民党武装力量——援闽粤军。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深受孙中山的器重。他是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1924年初，他奉命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年底，由于受到校长蒋介石的排挤，愤然辞职赴德国留学。

相似的经历使朱德和邓演达一见如故。他们时而在灯下谈信仰、谈主义；时而外出散步，到工人、居民中了解德国的社会状况。邓演达虽然比朱德年轻9岁，却由衷地钦佩朱德那充沛的工作精力。

---

当时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5页。

朱德致季子、莘农信，1925年3月7日。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4 月间，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为自己的军事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检阅活动。这个同盟是由德国的工人组成的，有 10 万人左右。这一天，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战士们穿着统一的制服，从全国各地云集柏林，许多柏林的居民送去了面包和水。朱德在参观了阅兵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颇为感慨地对阚尊民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不仅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

夏季里，朱德焦急地等待着中共旅莫支部的回音，他不知道是否会同意他去苏联学习军事的请求。这时，却传来了英国帝国主义在上海开枪残杀群众的消息。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击游行学生，死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后，激起了广大留德学生的极大愤慨。朱德在中共旅德支部召开的会议上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在中国留德学生会的组织下，留学生们来到中国驻德公使馆，迫使公使魏哀组在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通电上签名。

中国发生的“五卅”运动，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德共总部组织的声援中国的活动持续了 1 个多月。6 月 18 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应邀前往。来自许多国家的数千名留学生聚集在学校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这时，天下起滂沱大雨，但丝毫没有影响与会者的情绪，整个会场的气氛依然高昂、热烈。就在集会即将结束之际，大批的警察突然涌入会场，逮捕了 30 多名外国留学生，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他们被押上敞篷汽车，冒着大雨，被带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柏林警察当局的暴行，受到柏林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强烈谴责柏林警察当局为帝国主义同盟国效力的卑劣行径。德共领导人皮克及各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进行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留学生。

20 日，警察当局在柏林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朱德等人。但是，他的护照却被吊销了。

恰好这时朱德接到通知，中共旅莫支部执委会批准了他前往苏联学习军事的请求。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安排下，朱德于 7 月 4 日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轮船。

在德国的近 3 年时间里，朱德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通过参加革命实践，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他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

参见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红旗飘飘》第 25 集，第 45 页。

访问刘鼎记录，1978 年 6 月 3 日。

## 赴苏联学习

1925年7月4日，朱德随同中共旅欧支部组织的归国团一起前往苏联，同行的有林蔚、周唯真、杜基祥等30人。

轮船穿过波罗的海，抵达苏联的西海岸城市——列宁格勒。

一踏上苏联的国土，和谐、友好、热情的气氛，如同春风拂面，使朱德一行倍感温暖。在列宁格勒停留期间，他和同伴们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学校、集体农庄去参观、演讲。他观察到，无论是集体农庄的庄员，还是工厂的工人，或是职员、教师，从他们那发自内心的微笑中，显露出一种令人羡慕的自豪感，他们为生活在没有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压迫，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度里感到自豪，尽管他们的生活仍然清苦，吃的是黑面包，穿的是旧衣衫。陪同的苏联朋友告诉朱德，他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自从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国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当时，列宁去世还不久，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同伴中有人拿西欧的生活条件作比较，感到很失望。朱德则不这样看，他认为，“在列宁格勒，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却做了多少事啊！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正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

不久，朱德来到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这里，他遇到了先期赴苏的孙炳文和阚尊民。孙炳文兴奋地告诉朱德，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调一批人回国加强对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他也在其中。很快就要回国了。朱德则表示要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然而，朱德没有想到，他和孙炳文的这次分手竟成为永诀。两年后，当他在武汉见到孙炳文的妻子任锐时，才获悉孙炳文已经被蒋介石杀害了。194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曾写信给任锐，对情同手足的挚友作出饱含深情的评价。他在信中写道：

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列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

8月间，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会根据朱德本人的要求，同意他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此时又称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学、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唯物论、自然科学，还有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在学习经济地理时，不少同学对众多的统计表、数字感到乏味，对这门课兴趣不大。朱德虽然以前没有学过，学起来也感到很费力，但是他觉得，掌握统计方法很有益处，用具体数字有时更能说明问题。为了掌握所学的课程，他很少去逛街，除了重要的会议和节假日等活动外，终日埋头于书本中。

在这段时间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后来在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时说：“在德国时，也常常和李季他们讨论辩证法、唯物论的问题，但多不很深刻。在苏联，通过实际的接触，观察世界上的问

---

朱德致任锐言，1945年3月24日。

题，在认识上，就比在柏林时更深刻了。同时，对中国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了。”

几个月后，朱德便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个短期的军事训练班是中共旅莫支部为适应国内斗争的需要而设立的。参加军事训练班的还有欧阳钦、秦青川、阚尊民、房师亮等 40 多名来自法国、比利时、德国的中国革命者。

训练班设在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这里是属于东方大学管理的几个农庄之一。训练班的教官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其中大多是具有军事理论素养、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战略战术、战役战例、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由于朱德具有军人的经历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因而担任学生队队长。

在学习中，同学们对教官使用军事上的名词术语常有不理解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课余时，他还教大家如何使用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运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曾经和朱德在一起学习的阚尊民回忆说：“教官在讲授军事课时，我们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对于游击战术的问题，他懂得多，理解的也透彻。”朱德后来回忆说：“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

军事训练班的生活结束了。在半年的时间里，朱德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特别是他很注重把当代军事理论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之融会贯通。

1926 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这时，正在苏联的朱德听到这一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积极地为回国作准备。

2 月中旬，朱德和欧阳钦、秦青川、房师亮都接到了回国的通知。他们利用出发前的时间，相约来到莫斯科红场，瞻仰了列宁墓，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浏览了莫斯科的市容。此刻，朱德的心早已飞回了自己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能够马上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

《朱德自传》。

访问刘鼎记录，1978 年 6 月 3 日。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6 页。

## 七 在北伐革命中



## 回国

1926年5月18日，朱德踏上了返国的旅途。与他同行的还有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20多人。

火车行驶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车窗外，晨雾遮掩下的山脉，形同一条巨龙俯卧在天际，朱德的心绪随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上下翻腾着……

三年半的国外生活，拓宽了他的眼界，他不但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与腐朽，而且也看到社会主义苏联的活力与生机。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影响下，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问题，观察中国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帮助他解开了以往对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困惑，使他坚定地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漫长的旅途，令人感到心焦。对朱德来说，尤其如此。自从他听到国内准备进行北伐革命的消息后，他的心就从未平静下来。他认真地回顾了自己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讨袁战争，乃至护法战争的经历，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次回国的重要意义，他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开始的北伐革命上。

火车足足走了14个昼夜，终于到达铁路的尽头——海参崴。朱德一行人就在这里乘船返国。谁知海上不能通航，他们只好停留下来。在苏方的安排下，他们住进了郊外的一处别墅里。

风景优美的海参崴是苏联远东边疆的港口城市。这里山环水抱，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向山上望去，一幢幢房屋依山而建，而树木却很少。据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这里后，为防止游击队的袭击，将树木都砍光了。但是，没过多久，日本人还是被赶了出去。城内只有一条大街，地势居中，从街上俯视下去，可以看到一条条下坡支路。尽管这时已有了电车，但并不像大都市那样，充满着喧嚣声。

朱德和他的同伴们饱览了阿冈时加亚海湾的风光。此刻他的心就像那海水撞击着石岸一样，难以平静下来。他们焦急等待着，希望早日踏上国土。在等了1个多月后，他们终于搭上了一艘海轮，经过日本门司，向上海驶去。

7月12日，海轮驶入吴淞口。看到了祖国的大陆，朱德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

朱德一行在交通员的引导下，来到远离闹市的一幢楼房里，见到了在军委负责组织工作的王一飞。朱德激动地握住王一飞的手，要求尽早给他分配工作。王一飞理解朱德此刻的迫切心情。他向大家介绍道：

“目前的形势很好，我党决定抓住时机，壮大力量，争取北伐革命的胜利。

“最近，北伐军已经从广东出发，进展顺利。按照预定方案，北伐军主力首先在湖南、湖北战场打击吴佩孚的势力，而后集结兵力向东，打击长江上游的孙传芳部队。最后，北上讨伐张作霖。

“目前，我党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推动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战争，尽快在北伐军中健全政治工作。同时，还要防止杨森等地方军阀沿长江东下援助吴佩孚，以减轻湘鄂战场上北伐军的负担。因此，军委准备派一部分同志到广东去，一部分同志到四川或是北方去工作。”

王一飞的语音刚落，房间里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提出各自的要求。朱德向王一飞提出，自己和杨森曾有交往，到四川去比较合适。尽管4年没有来往，对杨森现在的情况不甚了解，但是，凭借过去的情面，还是

有可能说服杨森的。而且自己对四川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王一飞听后，觉得有理，答应考虑他所提的要求。

回到上海后，朱德再次见到了时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陈独秀。两人的会面颇具戏剧性，陈独秀没有想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是4年前被他拒绝入党的朱德。他细细倾听着朱德向他叙述国外的经历，朱德后来回忆说：“当时陈独秀谈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素有交谊，在他出国前杨森曾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希望他回国后能到四川去。陈独秀同意了朱德的请求，并且要求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利用他在滇军中的旧关系，去完成一项重要的调查任务。

当时，军阀孙传芳和齐燮元的部队部署在上海、南京等地，为了调查清楚孙、齐部队的实力，朱德找到了在上海的一些云南老朋友，他们向朱德提供了在孙传芳部队里的一些关系。于是，他登上火车，来到了南京。南京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总部所在地。他找的关系也是从前他在滇军中的旧相识，他们并不知道朱德的真实身份，因此，同他无话不谈。朱德很快就弄清了孙传芳的实力和军事部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7月26日，朱德和秦青川同船离开上海，前往杨森的驻地——万县。

## 九五炮声

1926年夏，北伐战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四川军阀的向背，对北伐战争是否能够在长江流域顺利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策动四川军阀易帜，配合北伐军在湖南、湖北作战，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得力干部入川工作。

朱德和秦青川是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名义到杨森那里去的。30日，轮船抵达汉口。他们在这里下船后，看到码头、街口到处都有吴佩孚的北洋兵在盘查过往行人，如临大敌。朱德先与中共湖北区委取得了联系，而后又给杨森拍去一份电报，告知他已从德国回来，几日后即到万县。他们在汉口停留一天，又继续乘江轮西上。这时，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江轮行驶得更慢了。船到宜昌，因遇水灾，又耽搁了4天，直到8月11日，他们才抵达万县。

朱德一到万县，立刻被迎进王家花园，这里是杨森的高级招待所，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自从接到朱德发来的电报，杨森心头不禁大喜，自己又多了一名骁将。这几年，川军系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为了争权夺利，战事不断发生。5月，杨森联合刘湘把贵州军阀袁祖铭逐出四川后，刘、杨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杨森投靠吴佩孚，刘湘则以孙传芳为靠山。杨森盘踞在万县一带，刘湘则屯兵重庆，两人势不两立。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北伐军从广东进入湖南，相继攻占湖南的醴陵和浏阳。7月11日，又攻占长沙。随后继续北上，锋芒直指武汉三镇。善观风向的杨森抢先于四川各派军阀，派代表赴长沙进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愿意接受其指挥。同时，他又派代表去找郭沫若、吴玉章联络，请郭、吴疏通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请求给予国民革命军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派代表到北京去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其派人赴万县协助工作。然而，他又同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5月下旬，吴佩孚离开汉口返直隶（今河北省）长辛店督师，准备联合奉军、直鲁军向冯玉祥据守的南口天险发动攻击。行前，他任命杨森为四川省省长。虽然当时杨森没有公开宣布就职，但是，他对吴佩孚还是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他到北伐军四处活动，无非是为自己寻找一条退路而已，决不是真心北伐。

朱德到达万县的第二天，杨森便兴冲冲地来到王家花园。

寒暄过后，朱德向杨森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此次入川所担负的使命，杨森不动声色地听着朱德的劝告。

其实，朱德深知杨森的为人，有奶便是娘，是杨森的一贯信条。当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十分器重杨森，杨森在赵又新面前也是极尽奉承拍马之力，曾有人劝告赵又新要提防杨森，赵却不以为然，可是，当滇军在成都龙泉驿一战大败后不久，杨森便投向川军，率部追击滇军。当赵又新在泸州被他的部下致成重伤，奄奄一息之际，杨森面对自己原来的顶头上司，大言不惭地表白自己反水是出于无奈，对赵深感歉意。赵死后，杨森还亲自备棺厚殓，并撰挽联，以示“悼念之情”。如今，杨森看到北伐军势如破竹，击溃了吴佩孚的层层防线，打到了长沙、岳阳，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急忙向北伐军输诚。可是，他却不肯离开吴佩孚这座靠山，仍然与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朱德后来回忆说：“杨森对我的接待，好像我是他最亲切、最老的朋友，

我没有抱幻想。他像所有的军阀一样，哪一方给钱多，就愿意加入哪一方”。

在朱德讲完之后，杨森信誓旦旦，一再表示，他早就渴望参加北伐革命事业，愿为国家的统一效劳。可是，他又向朱德提出，他的部队需要钱发饷，国民革命政府可以向他提供多少钱？朱德针对杨森脚踩两只船的暧昧态度，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政府正在进行北伐战争，不可能提供钱饷，他也没有带钱来。“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必然得胜，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一席话，说得杨森哑口无言。

8月25日，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从北京回到万县，跟随他一同返川的还有陈毅。陈毅是四川乐至人，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活动，被法国政府押送回国。后来，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北京从事国民革命运动。这次他是受李大钊的派遣，来到杨森部队进行兵运工作。

杨森见到陈毅后，毫不掩饰地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杨森还把朱德介绍给陈毅。“温温不作惊人语，大度自然是真雄”，陈毅对朱德那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敬意油然而生。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使杨森投向北伐军。

陈毅到达万县后没有几天，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先后攻克了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和驾胜桥，歼灭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将战线推向汉口外围。

杨森得知吴佩孚主力被歼的消息后，寝食不安，坐卧不宁，盘算着如何应付眼前出现的局面。然而，与此同时，一件更使他十分恼火的事又出现了。

8月29日，杨森所部官兵去云阳提取钱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商船“万流”号返回万县。当他们分乘10余只木船，准备押款登轮时，“万流”号突然启动加速，将3只木船浪沉于江中。据报告：“计损失八万五千银元，连长、排长各一名，士兵五十六名，枪支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

此前，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及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浪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屡有发生。不久前，杨森的师长郭汝栋在万县开完会，候船返回涪陵。适逢1艘上驶的英轮，郭带弁兵上船后，该船护船英兵当即解除郭汝栋弁兵的武装。杨森知道后，虽然怒火中烧，却也无可奈何。这次人、枪、饷俱损，杨森更为恼火。可他知道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吴佩孚对英国人都惧怕三分，他又何敢轻易得罪英国人。但是，人员葬身鱼腹，特别是巨额军饷沉没江中，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此刻，他想到了朱德和陈毅，便来到王家花园，找他们商量如何解决这一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德立即同陈毅和杜钢百（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生，与陈毅一道赴川）进行磋商。他们经过分析认为，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作靠山，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是一致的。要利用这次英轮浪沉中国船只的事件，迫使杨森转向广东国民政府，割断他与吴佩孚的联系。同时，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草菅人命的罪行早已恨之入骨。要抓住时机，广泛动员民众，领导民众开展起像“五卅”那样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00页。

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3人商定，由朱德做杨森的工作，陈毅负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杜钢百携朱德的亲笔信去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四川省委）书记杨公汇报情况。

朱德摸清了杨森的矛盾心理，便抓住他的弱点，力劝杨森扣留肇事英轮，他认为只有将英轮扣留，提出赔偿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损失。陈毅也认为应当扣留英轮，任何软弱的表示，只能助长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杨森沉思良久，他觉得朱德的话不无道理，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终于下决心扣留肇事英轮。

8月30日，当英轮“万流”号驶抵万县时，杨森即派人将它扣留。但是，就在轮船检查长偕同8名士兵登船询问该轮在云阳肇事经过时，停靠在一旁的英国兵舰“柯克捷夫”号上的英兵若干人也登上“万流”号，强行解除检查人员的武装。双方在纠缠中，英兵首先开枪重伤中国士兵2名，并将检查人员驱离轮船。接着，“万流”在兵舰的掩护下强行离开码头，向上游驶去。

杨森得到报告后，又气又恼，下令凡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只要停靠万县时，一律扣留。

第二天，太古公司的“万通”、“万县”号货轮停泊万县，被杨森部士兵扣留。杨森派员通知该两轮船长，太古公司必须首先赔偿损失，方可放行，否则不予放行。同时，杨森派宪兵司令于渊率一排士兵登轮驻守。随后，又致电重庆海关监督季叔平，正式向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提出抗议，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隔日，英国领事卢思德来到万县与杨森交涉，由于杨森坚持赔偿要求，以赔偿损失作为放船的条件。谈判毫无结果，卢思德只好悻悻返回重庆。

9月2日，万县图书馆内，来自工、农、商、学、兵、妇各界代表50余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联合抗英的行动。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向各界代表报告了英帝国主义在九江、广州等地犯下的无视中国主权、杀害中国同胞的罪行。朱德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派兵舰、商船进入中国的内河就是对中国的侵略。他们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杀害我同胞，浪沉我船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人民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他号召各界民众决不能等闲视之，大家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各界代表纷纷表示，为保卫国家主权，伸张民族大义，为死难的同胞雪耻，联合抵制英货，以示抗议。会场上群情激昂，气氛异常热烈。代表们议定，4日召开市民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

与英方的交涉仍在进行，却毫无进展。英领事态度蛮横，拒不答应杨森提出的赔偿条件。与此同时，英国兵舰分别从重庆和宜昌驶向万县，企图进行武力恫吓，迫使杨森放行扣留的轮船。

这几天，杨森一直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中。他虽然采取强硬态度，坚持赔偿条件，不仅没有向英人让步，而且对北洋政府外交部催其释放扣留船只的来电也未予理会。但是，他也在担心，如果英国人真的动用武力，使事态扩大，他在吴佩孚那里也不好交待。况且，刘湘拥兵自重，对吴佩孚任命他当四川省长一直耿耿于怀，图谋联合其他川军将领搞垮他。到那时，他或是逼上梁山，投奔广东国民政府，或是出走四川，落得无处安身，别无出路。

---

参见杜钢百：《万县惨案和朱德、陈毅同志》。

而这两条路都是他不愿走的。而若要在四川保留他的地位，没有吴佩孚的支持，他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左右为难之际，他只好来找朱德，想听听朱德的意见。

对于杨森的到来，朱德心中早已有所准备。他知道杨森目前顾虑重重，既想得到赔偿，保全自己的利益，又想息事宁人，早日了结此事，不使事态扩大。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阻止杨森退让，以利于反英活动的开展。他劝杨森不要害怕英国人的兵舰政策，只要他们敢于来犯，唯有坚决还击，别无选择。接着，陈毅将他拟定的《万县雪耻会宣言》交给杨森，并且告诉杨森，在次日召开的市民大会上，把宣言公之于众。

宣言上写着六大主义和六大要求：“（甲）六大主义：一、不供给英人油盐米炭；二、不作英买办水手领江及一切雇工；三、不与英人贸易往来；四、不装英货及接送英客轮；五、不买英人货物，也不卖货物与英人；六、不搭英轮。”“（乙）六大要求：一、废除中英间的不平等条约；二、在中国内河不得行驶英军舰，并取消英在华内河航行权；三、惩办肇事各英轮祸首；四、抚恤历年英轮浪沉民船死亡的商民官兵及家属；五、为历年英人溺沉同胞立纪念碑；六、英政府须向中国政府道歉。”

杨森看罢，没有立即表示态度。朱德在一旁说，民意不可违，民怨不可欺，只要我们不向英国人屈服，坚决要求英国人赔偿损失，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宣言提出的大部分要求，正是杨森所不情愿做的，这样下去，势必要影响他与吴佩孚的关系。可是，不同意这样做，又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呢？迫于眼前的处境，他只好表示同意。

于是，在朱德的劝说下，杨森下令在沿江一线配置山炮，同时，加派了“万通”、“万县”号上的守兵，以防不测。

9月5日午后1时许，平静的江面上突然掀起了波澜。一艘悬挂着英国旗帜的商船，在临近码头时，猛然开起快车，迅速向“万通”号靠拢。随即从船舱里涌出数十名手持快枪的英国士兵，冲上“万通”号，逼迫中国守军退出轮船。在争执中，英国士兵首先开枪，击毙2名中国守兵。中国士兵被迫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枪声惊动了万县的居民，他们纷纷涌向江岸，为中国守兵呐喊助威。枪声也惊动了朱德，他立即疾步赶往高笋塘杨森的官邸。

临近黄昏，枪声逐渐稀疏下来，英国商船吐着黑烟，离开“万通”号，仓皇向下游驶去，在沿江观战的群众禁不住欢呼雀跃，江岸沸腾起来。

突然，停泊在江中的英国兵舰“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扬起炮身，向县城方向猛烈地开起炮来。顿时，县城内火光四起，一片喊声。在炮火的尘烟下，许多无辜平民倒在血泊中，一排排房屋轰然坍塌。仇恨与悲戚笼罩着整座山城。

目睹着这一幕幕悲惨景象，朱德的心中燃起愤怒的火焰，他敦促杨森立即开炮还击。瞬间，十几门山炮怒吼着，英舰周围掀起一个个水柱。

这时，停靠在江岸的法国兵舰也向英国兵舰开起火来。原来，英舰炮轰时，法国真原教堂也遭到了炮击。

“打中了！起火了！”有人兴奋地高声呼喊着。

“威警”号中弹后，拖着黑烟逃离了万县江面，“柯克捷夫”号也随之

仓皇离去。

遭到炮击的万县城区，满目疮痍。中国军民死伤千余人，房屋倒塌千余间，城里最繁华的南津街、陈家坝一带成了一片废墟，到处可以看到倒毙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朱德向杨森建议，应立即通电全国，报告惨案发生的经过，并吁请北洋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惩凶、道歉。内伸民愤，外张公理，以重国权，以雪耻辱。当晚，朱德、陈毅拟好通电，以杨森的名义发向全国，控诉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的严重罪行。第二天，朱德委派孙壶东组织了“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一面做好死难同胞的善后事务，一面开展抗英斗争。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严厉制裁英帝国主义，为国雪耻，为死难同胞报仇。

当日，万县各界发出通电，痛陈万县惨状，通电称，万县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下，“瓦砾遍野，血肉横飞，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抵抗力争，战彼凶焰，伸我同权，雪此奇耻大辱”。

万县惨案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向全国，传向世界。

四川旅京团体通电：“威逼吾华数十年之英人，蔑视公理，侮我国家，视我人民如草芥，等我领土如殖民，猖獗横行，已达极点。”

上海学生联合会通电：“我全国民众，勿为彼所威吓，一致奋起，誓与英帝国主义反抗，以求中国民族独立之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英国帝国主义”。

万县惨案，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纷纷致电国内，表示侨胞愿为后盾，呼吁万县事件坚持交涉，绝对不可让步。

在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工人、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举行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采取的炮舰政策，声援中国人民的抗英运动。

在英国，人民群众对保守党政府在中国的政策表示极大愤慨，掀起了“不许干涉中国”的运动，各城市成立了70多个保卫中国革命委员会。

万县惨案的发生激怒了中国人民，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天津、长沙、济南、成都、重庆等城市相继成立各种组织，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正当各地纷纷发出通电、宣言时，杨森却有些心神不定，他刚收得吴佩孚的来电，要其和平了结此事，怎么办呢？参谋长朱连元和季叔平在一旁劝他还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办理此案，切不可使事态扩大。至于交涉一事，尚可坚持赔偿条件，按吴佩孚的意思，将扣留的英轮放行。杨森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恐怕以后不好收场，表示同意朱、季的建议，吩咐他们照此办理。

此时，北代军攻克汉阳、汉口的消息传到了万县。这一消息，对杨森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他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可偏偏事与愿违，这种局面却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思忖再三，决定先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再择退路。

恰好这时朱德要去汉口向中共湖北区委汇报工作。行前来找杨森，劝他早日作出选择。这回倒是杨森爽快地答应了朱德的要求，他请朱德转告邓演

达，他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易帜参加北伐革命。朱德后来回忆说：“‘万县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它迫使杨森投入了革命阵营。”



## 争取杨森易帜

9月中旬，朱德来到汉口，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中共湖北区委汇报工作；一是与邓演达商议改造杨森部队的各项事宜。

汉口街头，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学生们挥动着彩色的小旗，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革命歌曲，在街上向过往的市民宣传北伐革命。

朱德从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出来，便直接去找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两人自柏林分手，已经1年有余，如今在北伐战场上相逢，格外高兴。朱德向邓演达谈到，杨森目前的态度虽然回转，表示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是，此人心计颇多，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见风使舵，选择有利于他的一方。何况，他与吴佩孚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可能真正的回心转意。不过，就当前形势而言，与其拒绝，不如因势利导，逼他就范。邓演达认为，像杨森这样反复无常的军阀，终究是靠不住的，尤其是目前武昌尚为吴佩孚所占据，杨森对吴仍抱有一线希望。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吴佩孚，才能使杨森彻底打消依赖吴佩孚的念头。同时，他也同意朱德的看法，鉴于杨森手中还握有数万军队，又有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表示，还是应采取稳住他的策略为宜，并给予其国民革命军的称号。

在汉口期间，朱德还参加了旅鄂川人万县惨案后援会成立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此次开炮，兄弟亲与此役。英人之强横，可笑亦复可怜。他以为他的枪才可以杀人，我们川军，这回也不客气，为正当防卫，还他几枪，彼此都有伤亡，不过人民无辜，为他杀得太多了。”“但是，我四万万民众为他打醒了，尽都知道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总望军民一致，团结起来。”

郭沫若等人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9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正式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由于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启修还在汉口主持《民国日报》副刊，朱德暂时兼代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同时，决定由朱德带领20余名政治工作人员入川，以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政治工作。

25日，朱德走进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办公大楼，邓演达把他带入二楼的一间会议室。此时，房间里已坐满了身着军装的军官们。朱德趁着邓演达向众人介绍情况的工夫，仔细观察了来开会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个个精神饱满，富有朝气。邓演达向朱德介绍说，在座的就是随他一同入川的政治工作人员。随后，邓演达又把杨逸棠介绍给他，总政治部委派杨逸棠担任朱德的秘书。通过邓演达的介绍，朱德知道这些人大多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有从德国、日本回来的留学生。邓演达讲完之后，朱德扼要地介绍了杨森及杨森部队的情况，并且告诉大家，因目前宜昌还驻有吴佩孚的军队，所以，走的时候必须化装，到万县集中，一路上要谨慎从事。

28日，朱德和随行的政治工作人员登上开往万县的江轮。他们中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是学生装扮，有的挑着担子……

这时，四川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中共重庆地委加紧了军事起义的准备工作。地委书记杨公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

---

《旅鄂川人对万案之愤慨》，《国民公报》（成都版），1926年11月6日。

1928年5月，吴玉章、杨公等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将临时省党部设在重庆莲花池。

党部名义召集黄慕颜、秦汉三等倾向于北伐革命的川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部署，并且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以刘伯承为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选择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中共中央对四川的军事运动一直十分重视。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就在报告中提醒国民党中央，他说：“四川居长江上游，人口有七千万，地大物博，实居南北最重要的地位。现在北方军阀正在内溃的时候，我们革命军要往北发展，要同西北革命军联合，四川实为一大关键。”会后，中共中央委派吴玉章、杨公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入川工作，旨在争取和策动川军易帜倒戈，发展共产党的力量，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朱德赴杨森部工作就属于这一方案的一部分。至8月间，四川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得到广泛的开展，全省形成了相当牢固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党组织派到何光烈部（顺庆）、袁品文部（泸州）、黄慕颜部（合川）和黔军王天培部的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等人，在策动何、袁等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共重庆地委根据四川形势的变化，向党中央提交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调查》两个报告，详细报告了四川各派军阀的政治态度、军事实力，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策划起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对军阀的投机特点及利用这一特点开展工作的有利之处等问题都作了认真研究。认为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部分川军起义，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但是考虑到运用暴力手段建立新的武装是一项重大行动。认为必须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不能草率从事。不久，中共重庆地委又派地委委员童庸生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童庸生在报告四川情况时指出：“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是可能的。杨森现有委朱德为参谋长兼统一师之意。”中央在听取童的报告后，同意了重庆地委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和初步方案。认为：“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因而对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寄予很大希望。

江轮在迷蒙蒙的晨雾中缓缓地穿行，晨霭中夹带着泥土的清香，沁入肺腑。朱德走上甲板，努力吸吮着清新的空气。杨逸棠也跟在后面踏上甲板。

“党代表，听邓主任讲，你从前是个将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杨逸棠靠着船舷，好奇地问朱德。

“噢，那是10年前的事了，我在四川打仗，唐继尧给了我少将旅长的职务。那时，只想打出个名堂来，可是，打来打去才知道是为他们争夺地盘在打仗，后来，没得法子，就跑到国外去找革命的道路。”朱德颇为感慨地说。

“那你和邓主任是怎么认识的？”杨逸棠又问道。

“在德国认识的，我们都做过军人，又谈得拢，在一起什么都讲……”朱德向杨逸棠述说着他和邓演达相识的经过。

听了朱德的一席话，杨逸棠很是敬佩，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朱德。

---

吴玉章：《四川临时省党部党务报告》，1926年1月。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朱德展开纸，只见上面写着：“佳会深宵汉上逢，座中有客态从容。崎岖约共川东去，革命分劳一试锋。”

“唔，写得不错。”朱德赞许道。又问：“这座中客是指的谁？”

“是指党代表。”

“噢，过奖了。”朱德谦逊地微笑着，说：“北伐革命的形势于我们很有利，照此发展下去，胜利的日子是不会太远了。你说，我们大家都很从容吧？”

接着，朱德又和杨逸棠聊起诗来，他希望杨逸棠以后如作新诗，一定拿来给他看看。

江轮抵达万县，已经得到消息的杨森早在码头上等候。他一面吩咐参谋长朱连元给政治工作人员安排住处，一面即陪同朱德来到南津街的宝隆洋行，这里已改作杨森的招待所。

朱德将委任状交给杨森，并催促杨森早日宣布就职，而杨森却极力回避就职一事，一再询问朱德，国民政府是否答应给他调拨军饷。他以为，只要有了国民革命军的称号，就可以得到军饷了。朱德告诉杨森，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北伐，财政上有困难，他和他的部下都没有军饷，只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况且，杨森依靠在他的防区内所收的税是足够维持他自己的军队的。杨森听后，大为失望，极力向朱德表白，仅靠税收是不足以维系他的军队的，还是希望朱德代他向国民政府申诉其苦衷。朱德向杨森提及，随行的政治工作人员来万县的主要任务是向官兵及民众宣传三民主义的主张，宣传北伐革命，使民众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与军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完成北伐革命大业。朱德后来在谈到杨森当时的态度时说：杨森听说这些政治工作人员是来按三民主义的原则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大吃一惊。杨森宣称：“他的士兵不需要政治教育；道理很简单，士兵的职责就是接受命令，战死沙场；这些文质彬彬的人，和士兵谈些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有什么用处呢？这些侈谈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的议论，只能惹出抗命或公开叛乱的事，别无其他效果。”

当朱德再次问到就职一事时，杨森只好向朱德交了底，他已经派兵东下武昌，为吴佩孚的部队解围。朱德尽管对杨森此举早有思想准备，但当他听到杨森已派兵东下后，对杨森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劣伎俩感到十分气愤。他规劝杨森不要执迷不悟，因为吴佩孚的垮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对吴佩孚的任何幻想都是不能成为事实的，希望杨森及早悔悟。杨森对朱德的劝说，却不以为然，仍要坚持观察一段再作抉择。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朱德和杨逸棠来到政治工作人员的住所，这里的条件很糟糕。他一进客店，政工人员们立即围了过来，有的询问朱德与杨森谈话的情况；有的骂杨森欺人太甚，有的说杨森仍然挂着五色旗，毫无易帜的表示。朱德压住心头的怒火，告诫大家不要忘记来到万县的主要任务，对杨森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像他这样的军阀本性难改，不用事实教训杨森，他是不会回心转意的。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消息很快传到万县，杨森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变，开始允许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宣传，但仍没有把东进鄂西的部队撤回来。朱德布置政治工作人员做好准备，要把北伐革命的胜利消息向民众广为宣传。

没过两天，杨森即派人来通知政治工作人员搬到宝隆洋行去。在这里还住着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的代表，以及国家主义派曾琦、李璜的代表。用杨森的话来说，人不分东西南北，只要能派上用场，对他有利，来者不拒。这就是他处理与各派政治势力关系的原则。

回到万县后，朱德就派杨逸棠前往重庆向杨公汇报杨森的情况。作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的杨公，1925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还担负着国民党四川省临时党部的实际领导工作。10月中旬，杨逸棠带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要求尽快在二十军中以国民党的名义建立组织，抓紧政治宣传工作，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为此，朱德决定首先建立国民党第二十军军党部，等待条件成熟时，即向各师、团及基层发展，建立分党部、支部。同时，朱德还和政治工作宣传队队长唐午园等商定，办一份小报，向万县民众进行北伐宣传。

不久，政治宣传队员按照北伐宣传大纲的精神创办名为《壁报》的报纸。

《壁报》的出版发行，深得市民的欢迎，但也引起国家主义派的仇视，他们唯恐国民革命的影响深入民众，便办了一份《快刀报》，想与《壁报》抗衡。在第一期上，他们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攻击北伐革命是“作乱”、“祸国”，诋毁广东国民政府是“叛乱政府”。不仅如此，他们还跑到杨森那里告状，说政治宣传队的作法是“扰乱民心”。起初，杨森认为，自己已向朱德作过保证，不干预政治宣传队进行北伐革命的宣传，何况两张报纸争论的问题与他无大干系。因此，他对这件事睁一眼、闭一眼，并未理睬；可是不久，参谋长朱连元常在他耳边嘀咕，说《壁报》宣传赤化，蛊惑人心，等等。杨森生怕这样下去会出什么乱子，于是，干脆下令将两家报纸一并封闭。

朱德得知此事，立即去找杨森。起初，杨森以两家报纸一起封闭为借口，劝朱德不要再争论下去了。继而，他又把朱连元的话搬出来，说他不能允许在万县进行共产党的赤化宣传。其实，他自己根本就没看过《壁报》。朱德取出报纸，据理力争，说得杨森理屈词穷，无言以答，不得不同意《壁报》继续办下去。这一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势力的猖狂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支持北伐战争的信心。当时杨逸棠在欣喜之余，曾作诗一首：“开基创业似开荒，《壁报》宣传动一方。三十同仁齐努力，居然开府宝隆行。”

10月底，朱德致信中共湖北区委，报告杨森的态度仍旧暧昧，迟迟不肯就职。每到提及就职一事，总是敷衍搪塞地说：“只要走革命道路，迟早宣布就职没有多大问题”。

这时，杨森的确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局势能够按照他的估计而变化。从9月下旬，杨森接受了孙传芳的钱款之后，将四师之众集中于宜昌卢金山（吴佩孚所属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处，名为“北伐”，实为“援吴”，欲与孙传芳同时出兵，东西夹击北伐军，以解武昌之围。没想到，北伐军于10日攻占武昌，使吴佩孚的部队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杨森又将希望寄托在孙传芳身上，仍令部队东下，并从北伐军手里夺得枝江、公安、石首等县。然而，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使他感到担心。

11月初的一天，刘伯承和欧阳钦突然来到万县，朱德不禁喜出望外，连忙吩咐卫兵备足酒菜，为刘伯承、欧阳钦“洗尘”。

朱德和刘伯承初识于1918年川、滇军谈判期间。那时，刘存厚刚被驱逐出川，朱德代表滇军与川军熊克武谈判，商讨善后事宜，熊克武派出的代表

就是刘伯承。1920年，川、滇军战事再起，朱德和刘伯承在战场上又成了争杀的对手。1937年，朱德在同史沫特莱谈到刘伯承时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的道路。”刘伯承对朱德的为人十分敬佩，虽然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曾当着众人之面戏称“朱德是他的手下败将”，但由此却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认为，朱德“志坚如铁，从无失败情绪。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一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国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

“哈哈，朱玉阶，想不到泸州一面，已去八年，竟在这里见到你，怎么样，你不是代表滇军和我谈判的吧？”席间，刘伯承毫无顾忌地开着玩笑。

“那时咱们各为其主，谁还晓得今天能走到同一条道上来。”朱德温厚地笑着说。

“唉，你可不知道，1920年我们俩在成都大打出手，我把他打得好惨，从川中一直追到川南。”刘伯承扭过脸得意地对欧阳钦说道。

“昔日是对手，今日成为同志，能在此相会实在是来之不易啊。”欧阳钦感慨地说。

“伯承，过去的事不谈了，你说说这次到万县来有啥子任务？”朱德言归正题，急切地想知道刘伯承此行的目的。

刘伯承告诉朱德，他和欧阳钦是奉党中央的指示入川工作，马上要到重庆去。他在上海时，中央有关同志已向他介绍了杨森的情况。

朱德说，他对杨森耍两面派手法，派兵进犯武汉一事颇为头痛。欧阳钦在一旁愤愤不平地说，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刘伯承接着说道，中央决定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决定在四川成立军委，由杨公、朱德和他负起责任，统筹策划军事起义。

临别时，刘伯承告诫朱德，对杨森要多加防范，如有不测，可先到重庆去。朱德要刘伯承尽管放心，无论策动工作有什么困难，他都有充足的信心去完成。待杨森这边的工作有了眉目，他立即去重庆商讨起义事宜。

刘伯承走后不久，杨森就急匆匆找到朱德，迫不及待地提出就任二十军军长的事情。并且一再向朱德表白，他派兵进犯北伐军实在是出于无奈，决非其本意，他愿意派人赴武汉，向邓演达作出解释，请求宽大。他恳请朱德也为他向邓演达求情，不究既往。

事后，朱德了解到，北伐军于11月初先后攻克九江、南昌，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随之集中兵力向进犯武汉的杨森所部实行反击，杨森部遭到北伐军的围歼，余部逃回宜昌。前敌总指挥曾子唯作了北伐军的俘虏，被押往汉口。

杨森迫于形势，不得已表示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这种不得已的决定，不仅是迫于北伐军方面的压力，而且他还顾虑到来自刘湘方面的威胁。

朱德早已料到杨森一定会采取委曲求全、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抓住这一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7页。

194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机会，向杨森提出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对部队实行改造的建议。杨森被迫一一应承下来。朱德决定立即动身前往重庆，他嘱咐杨逸棠要密切注意杨森的动向，如有情况，尽快向重庆报告。

临行前，朱德把政治工作人员卢振纲、文强、滕代顺、江亚中等人召集来开会。在随他来万县的20多名政治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另有几人是国民党左派。因此，朱德他们一到万县，就在政治宣传队中建立起共产党支部，以协调各项行动。在会上，朱德把杨森决定就职一事告诉与会者，要大家趁热打铁，做好建立军事政治学校的准备工作。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朱德启程前往重庆。

江轮驶近朝天门码头，已能清晰地看到码头上聚集着许多手持扁担的挑夫，他们在等待着江轮的到来。

此刻，朱德的心情是不平静的。4年半前，当他离开这座山城时，还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不知道他所要选择的道路在何方。可是，今天他已坚实地站在革命的土壤上，从事着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伟大事业。

朱德在浮图关刘伯承的家中见到了杨公。两人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是神交已久。从杨公的来信中，朱德猜想出他是个精明、干练的领导者。见面之后，果然印证了朱德的判断。他没有想到，这次会面之后，仅仅过了4个多月，杨公便壮烈地牺牲在军阀刘湘的屠刀下。30年后，他为缅怀这位四川卓越的党的领导人，亲笔书写了“永垂不朽”四个大字，镌刻在杨公的墓碑上。

会议开始后，杨公首先宣布了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的决定，由杨公任军委书记，朱德、刘伯承任委员，3个人组成军委会。接着，杨公把组织武装起义的详细计划向朱德作了介绍，并告诉他，12月初在泸州、顺庆首先起义，由刘伯承指挥这次军事行动。而后，杨公和朱德、刘伯承又讨论了起义的各项具体问题。朱德的任务仍然是做争取杨森的工作。

按照军委会的部署，朱德一回到万县，立即敦促杨森就职。最后议定，朱德和杨森一同前往宜昌，于21日通电宣布就职，同时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

11月16日，朱德和杨森登上开往宜昌的江轮。一路上，杨森强作笑颜，向朱德谈起易帜后的设想。言谈中，他仍然强调要“保境安民”的意图。朱德心里十分清楚，杨森所谓的“保境安民”，实际上还是想脱离国民革命，独霸一方。对此，朱德并不想表明自己的态度，总是把话题拉到易帜后如何改造部队上。杨森正处在窘境中，言不由衷，又无可奈何。21日，杨森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职，朱德担任二十军党代表。但是在同一天，杨森又致电吴佩孚，表示他对吴佩孚的“忠诚”，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性。

朱德从宜昌返回万县后，在二十军设立了国民党军党部，自任主任委员。并且在杜家花园建立了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宣传队的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谌杰等分别担任军政学校教育长和各个大队的大队长。在学校成立的当天，朱德到校讲话，勉励学员说：“一个军人要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要有坚强的革命方向，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光辉事业。”在朱德的积极努力下，没用多长时间，政治工作人员的宣传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革命

的气氛越来越浓。此时的杨森有口难言，他恨不得朱德尽早离开万县。

12月初，泸州、顺庆先后爆发起义，以刘伯承为总指挥的六路起义军，计1.2万余人，打起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尽管泸、顺起义最终是失败了，但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此后，中共中央将军事运动的重心从四川移向江西，领导泸、顺起义的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陆续奔赴江西南昌，成为后来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

泸、顺起义后，朱德曾到过泸州，顺便看望了他的一些旧友。恰逢原泸州团练局长文承休60岁生日，朱德携圭碗一对前去祝贺，旧友重逢，百感交集，朱德当场赋诗叙情：

颂寿难忘脱难朝，携将圭碗赠单瓢。  
公今六十身犹健，成甫知非鬓已凋。  
血战疮痍嗟满地，操戈逐鹿碑群臬。  
人皆可以为尧舜，誓救民生路一条。  
一戎衣竟溃纷争，回首韬机尚自评。  
鲁肃赠园长者意，元璋留柬故人情。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我本江南一鳊生，十年从事亚夫营。  
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  
别有良图酬壮志，难忘盛意问前程。  
劳人乌马空归去，大好河山创太平。  
神州沉陆世沧桑，锦绣河山坏虎狼。  
观变安居徒负负，乘时窃利正忙忙。  
人生乱世心难测，我欲回天力自强。  
水深火热民望救，安危度外不思量。

朱德回到万县后，即得到泸、顺起义军失利的消息，他急忙派人携款赴开江，援助撤至开江的刘伯承。

这时，国内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蒋介石竭力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准备公开反共。杨森看到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貌合神离的关系，开始与蒋介石派往四川的代表暗中来往，随时准备投靠蒋介石。同时，他和北洋军阀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不久，杨森主动找到朱德，说他准备派一军官考察团赴武汉参观考察，因朱德熟悉武汉方面的情况，希望朱德能率团前往，对于杨森的企图，朱德心中是清楚的。但是，他还是决定率团赴武汉。

12月底，朱德带领由杨森部中下级军官90余人组成的军官考察团，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

---

圭碗，实则细瓷薄胎制成的碗。

陶体贵：《沛云堂立雪杂录》。

## 南昌的曙光

朱德在武汉停留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布置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利用他与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1927年1月1日召开的北伐军军务善后会议上，第三军升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又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培德任总指挥，下辖第三、九两军）的同学关系，赴南昌筹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这时，随他到武汉的第二十军军官考察团成员中，有40多人返回四川，30多人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八军，其余的表示愿意跟随他到江西去。

1927年1月间，朱德率原二十军军官考察团的10多名成员，来到了江西南昌。

当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滇军系统的朱培德部。朱德同朱培德、王均、金汉鼎、杨如轩等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他的许多旧部和老同事。这种特殊的关系为朱德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朱德来到南昌，自然受到朱培德的欢迎和信任，他任命朱德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并为朱德安排了住所——坐落在百花洲畔的花园角二号。

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北伐革命尚未取得成功，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挑起事端，制造分裂，企图达到独揽军党政大权之目的。就在国民政府通令定都武汉后不久，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形势的发展趋于复杂化。

作为滇军系统的朱培德，很清楚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所以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然而，由于他掌握着军队，蒋介石也不会轻易得罪他。因此，他对蒋介石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对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朱克靖等一批政治工作人员颇为器重，希图借助这些政治工作人员，提高部队的素质，加强战斗力，同时，又与国民政府保持着联系。

由于第三军在攻打南昌的战斗中，部队的伤亡很大，现任的中下级军官中，不少是在战斗中因战功而提升起来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比较差，很有必要整训提高。为此，朱培德决定创办军官教育团。

1月下旬，在朱德的主持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正式开学了。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讲武堂。经过挑选的1100多名学员编为3个营：第一、二营称为学员营，计700人，都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第三营称为学兵营，主要是江西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教育团内的各级军官和教官大多是从第三、九两军中抽调的，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任职前，都是经过考核，而后按照每人的实际水平，分别委以连、排长职务的。这种量才录用的做法，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

朱德很重视学员政治思想的进步和军事素质的提高，尤其注重对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的教育。在政治课中，除讲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外，还增加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内容。朱德还经常请从事工运、农运的共产党员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来授课，使学员们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当年曾跟随



朱德到南昌的徐震球回忆说：朱德平时“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他有马不骑，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团里大操场，还要带领一团人一起跑三十分钟的步。在出操时，他亲自向学员做示范动作，耐心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真是诲人不倦，处处以身作则”。开学后不久，教育团里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军官教育团虽然名义上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从开创伊始，就处于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之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军官教育团的共产党支部很快就建立起来，支部书记陈奇涵是江西省委派来的，公开身份是教育团参谋长。虽然党组织的活动还处在秘密状态中，人数也不多，但它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军官教育团还为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举办短期训练班，并派出学员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会。

3月5日，军官教育团里彩灯高悬，鼓号齐鸣，吸引了众多的市民。他们挤在校外空场上，好奇地张望着。这一天，军官教育团要补行开学典礼。朱德和副团长刘介眉、党代表魏瑾钧、参谋长陈奇涵等，站在大门口迎候军政各界的来宾。当时还在南昌的蒋介石，在朱培德、李烈钧（时任江西省主席）、王均、金汉鼎等陪同下也来参加开学典礼。

朱德来南昌之前，在武汉见过蒋介石。那次见面留给朱德的印象是，蒋介石是一个不苟言笑，待人谨慎，城府颇深的军人。他到南昌后，又听到不少有关蒋介石的议论。他认为蒋介石对权力的追求远胜于对指挥北伐战争的努力。

朱培德把朱德介绍给蒋介石，并称赞朱德文武兼备，办学有方。当朱德与蒋介石握手之际，双方都未曾料到，日后两人竟成为红军与白军的统帅，在战场上进行了20多年生死搏杀的敌手。

在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拖着一腔浓重的浙江官话说：“第三军追随中山先生革命，有着悠久的历史。此次北伐，也很英勇，打垮了孙传芳、邓如琢，收复了南昌。”蒋介石把第三军夸奖了一番，又说：“国民革命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本总司令甚感欣慰。当初，总理在世，一切由总理作主，现在总理已经过世，中正肩上的担子加重了……我们要作总理的信徒，总理在世，我们一切信赖总理，现在总理不在世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作为我们信赖的中心……总理在世，一切服从总理，现在总理已去世，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就必须有一个服从的中心。”蒋介石挥舞着手臂，情绪愈发激动起来。台上、台下的人听他说了半天，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蒋介石演说完毕，就匆匆地离开了会场。

朱德在朱培德、李烈钧、王均讲话后发言，他告诫学员说：“北伐革命打倒了旧军阀，又出了新军阀，旧军阀要打倒，新军阀同样也应打倒……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新军阀在我们革命阵营中产生……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

---

徐震球：《大革命时期跟随朱委员长的片断回忆》，1978年3月10日。

赵：《朱德元帅革命事迹回忆片断》，1960年6月23日。

3月的江西，工农运动在蓬勃发展，但也潜藏着一股反革命暗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已经举起了杀人的屠刀，他们的破坏活动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日益加剧了。就在蒋介石参加开学典礼的第二天，他就指使驻赣州的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中的AB团（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的反动政治组织）头子段锡朋、程天放在蒋介石（已于15日离开南昌）的授意下，强行解散原来由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等民众团体，封闭了国民党左派掌握的《贯彻日报》社。17日，到达九江的蒋介石峻使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纠合一伙流氓歹徒蓄意滋事，围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在市党部打死3人，在总工会打死1人。

消息传来，激起江西各界民众的极大愤慨。3月18日，南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大校场举行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会后，游行队伍来到江西省政府办公处，要求省主席李烈钧主持公道，严惩杀人凶手。朱德率领军官教育团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他对学员们说：“反动派已屠杀我们的同志了，我们要准备出击。”30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的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收缴了蒋介石派驻南昌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支。

30日晚，朱德从军官教育团回到家中，他一踏进大门，刚从南溪来到南昌的妻子陈玉珍迎上前来告诉他，有一名叫高浩然的第三军参谋正在客厅里等候，像是有很要紧的事。

“玉阶兄，不认识了？”朱德一进客厅，来人便站起身唤道。

“哈哈，哪里是啥子高浩然，沫若兄，有啥子事这么急啊？”朱德微笑着说。

朱德在汉口时与郭沫若相识，那时，两人谈得很投机。

郭沫若把他从安庆化装来南昌的经过向朱德述说了一遍，并提出要借宿朱德家中，写一篇揭露蒋介石罪恶行径的文章。

两天后，郭沫若将撰写好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交给朱德，请他先看看。朱德接过来细细地看起来。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英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朱德看罢，连声称道。郭沫若告诉他，这篇文章要尽快送到武汉去，公之于众，以唤醒广大民众投入到反蒋的斗争中去。

陈赞贤的死，激怒了南昌的广大民众。4月2日，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发动下，南昌工农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军官教育团也派出部分学员，身穿便衣，携带短枪，加入到游行队伍中。人们高喊着“打倒蒋介石！”“反对新军阀！”“惩办杀人凶手！”的口号，拥向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原来掌握在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人士的手中，蒋介石到南昌后，以“圈定”的方式将方志敏等人排除在外，而以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取而代之。所以，出现了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当游行队伍在方志敏的带领下来到百花洲时，群众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争相冲进省党部，把 AB 团头目程天放、罗时实等捉获。并在第二天召开有 3 万余群众参加的大会，将程天放等人游街示众。

“四·二”暴动取得了胜利，南昌各界人士联名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改组江西省政府。

4 月 7 日，朱培德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在他的推荐下，朱德于 9 日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市政委员会委员。他到任后，在全局干警大会上告诫大家，要切实负起责任，保护民众，尽快恢复南昌的秩序。

在江西全省，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对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这时的朱培德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他既没有去制止革命力量的发展，也没有帮助革命力量去镇压反革命。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江西的工农运动比较顺利地得到了发展。

4 月间，朱德奉命亲自率领军官教育团的部分学员前往赣东临川一带剿匪。他在出发前告诫学员们：要注意纪律，不许像旧军队那样糟蹋老百姓。只有老百姓看你们真像革命者，你们的工作才能展开。当时曾参加赣东剿匪的赵 后来回忆说：“部队开到赣东临川、贵溪、崇仁一带。当地的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以为‘救星，来了，革命群众也曾一度对我们发生误解。但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援助工人农民斗争的方针，首先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以坚决打击，随即派出人去指导农民斗争的开展。农民运动得到支持和指导，更加发展起来。在部队奉命调回南昌时，党又派了教育团党部干事黎素同志任临川县长，留下二营营长郑桥松担任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姓卓的副官主任为临川县公安局局长。”赣东之行，不仅是对当地农民运动的支持，而且使军官教育团的学员得到一次实际锻炼的机会。

4 月以后，国内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于 4 月 12 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顷刻间，中华大地阴霾密布。腥风血雨中，蒋介石彻底撕开了革命的伪装，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当时还保持着国共合作关系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造成“宁汉分流”的复杂局面。继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之后，5 月 17 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5 月 21 日，何键部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反革命的屠刀下惨遭杀害。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出了叛变革命的信号。

这时，身为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顾虑颇多。作为地方实力派，他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不寻找一个政治上的靠山。眼前，蒋介石虽然被武汉国民政府罢了总司令的职务。可是，蒋的势力不仅坚挺，而且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他必须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当然，在反蒋的问题上，他一时还不能违背武汉国民政府的意志。因此，他思忖再三，力图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使他保留充分的回旋余地。

5 月 29 日，由第三军参谋长出面，向朱克靖等人转述了朱培德的意思。

---

参见赵 ：《忆南昌军官教育团》，《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6 页。

朱培德提出，目前军队中军政人员之间发生了矛盾，请政治工作人员暂时离开江西，以避免出现不利的结果。同时，朱培德还发布告示，称：这次处置政治工作人员是为了适应环境，并无其他用意；他始终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打倒蒋介石；不许有人以共产党为名作告发，或以反共产党相危害。这就是朱培德采取的所谓“礼送”共产党员离境的办法。虽然他一时还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公开反对共产党，但此举用意如何，后来的所作所为足以作出证明。

6月6日，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被迫离开江西。与此同时，朱培德以危害部队利益为借口，下令全省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此时，正在临川的朱德听到朱培德“礼送”政治工作人员离境的消息，立即致电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长一职。

6月中旬，朱德返回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犹如一潭死水，往日那种勃勃生气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沿街墙壁虽给雨水冲刷，但仍能看清上面的字迹：“欢送共先生出境！”“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等。

一回到教育团，朱德就得到了朱培德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和陈奇涵等经过商议，决定第一、二营学员700多人提前毕业，第三营400余人留下继续学习。毕业的学员除一部分回原部队外，一部分被派至赣江流域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做工会、农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干部。

6月下旬的一天，朱德来到高升巷朱培德的公馆。他要弄清朱培德目前的态度。朱培德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寒暄过后，朱德问起朱培德前一段发生的事情，朱培德面露难色地告诉朱德，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治工作人员不走，只有他走，否则，这支队伍是带不下去了。至于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他解释说，这是由于部下反映强烈，出于无奈才作出此决定。对于朱培德的托辞，朱德无意与他争辩，只是劝告朱培德要三思而行。

朱培德望着当年和他并誉为“模范二朱”的老同学，婉转地向朱德表示，希望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离开江西，免得有人拿他与民众团体的密切关系做文章。朱德很清楚朱培德此时的心态，他们毕竟有过令人难忘的同窗之谊。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托辞去武汉办事，立即离开南昌。

第二天，朱培德把朱德送上开往九江的火车，他的心里也踏实了许多。朱德到九江，受到金汉鼎（此时兼任九江警备司令）的欢迎。他上庐山与金汉鼎小叙数日，便登上开往武汉的江轮。

时至7月，形势愈加严峻，宁汉合流已成定局。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武汉国民政府背弃孙中山实行的三大革命政策。同时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然出洋，宋庆龄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叛变革命。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反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面临着严重威胁，这时共产党人不得不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部队，主要有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这两支部队当时正集中在江西九江一带准备东征讨蒋。

7月18日，朱德在武昌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场的气氛异常的凝重，每一个与会者都很清楚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自己所承担的责

任。对这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改变了过去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会议决定在继续进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还要武装农民和工人。开展土地革命。……我们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铁军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之后便进军广州，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政府。……我们在这次秘密会议上通过的政策被总结成这几句口号：‘继续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开展土地革命。武装人民。’我对所有这些措施都投票赞成。……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分别前往自己的岗位。……鉴于我对南昌了若指掌，分派给我的工作是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的部队的情况，不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在武汉期间，朱德探望了孙炳文的妻子任锐，获悉孙炳文已惨遭杀害。

4月中旬，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正在广州的北伐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孙炳文，奉命前往武汉。船抵上海，由于同船的汉奸诸民谊的告密，孙炳文被法国巡捕房逮捕，随即被引渡至总司令部特务处。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孙炳文仅被关押了3天即惨遭腰斩。

听到肝胆相照的挚友遇害的消息，朱德悲痛不已。他劝慰任锐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把子女抚养成人。

7月20日，朱德乘船抵达九江。在九江警备司令部的门口，他恰好遇到准备上庐山的金汉鼎。金汉鼎匆忙地约朱德一同上船再谈。

路上，金汉鼎告诉朱德，刚接到朱培德从庐山打来的电话，说汪精卫和张发奎到了牯牛岭，朱培德要他立即上山，有要事商量。

“啥子要事？”朱德追问道。

“我也不清楚。只是近来风声愈紧，流言纷坛，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

“益之（朱培德的字）近来态度如何？”朱德进一步探询道。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他当然是倾向于汪精卫。”

“铸九（金汉鼎的字），你打算怎么办？”

“我有什么选择，还是跟着朱培德一起干吧。”

“铸九，江西这班人都是灰色的，不愿革命了。我们一同到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重振北伐大业。”

金汉鼎对朱德的一席话表示怀疑，他劝朱德刚到江西，对近来的形势不了解，还是谨慎行事为好。显然，他没有答应朱德的要求。

船到莲花洞。这会儿，去南昌的班车已没有了，金汉鼎约朱德上庐山留宿，待次日再回南昌。朱德谢绝了金的邀请，留在莲花洞，等候第二天的班车。

关于金汉鼎上山后的情况，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午后四时，我到牯岭，朱培德的副官引我到花园饭店，和汪精卫、朱培德、张发奎、黄实见面，我觉得他们除张发奎外，神色有点不自然。朱培德说：‘刚才汪先生和我们谈了些江西目前的局势是外松内紧，情形是严重的。’他要我快去南昌，将所有军用物资和军需品全部装运到吉安去。”

朱德回到南昌后，立刻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他时而出入于民众团体，时而与驻军南昌的军官们举杯言欢，时而又带着警卫走街串巷，仔细观察着每一座建筑物。几天的工夫，他就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精心地绘制出

---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30—231页。

金汉鼎：《八一起义前后见闻点滴》。

南昌市区的地图，整理出南昌驻军兵力部署的情况。

7月27日上午，周恩来走进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他的到来使朱德感到异常的兴奋。朱德意识到，起义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

朱德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汇报起南昌的情况。

“目前，南昌城内外驻有朱培德的5个团和唐生智的1个团，加上一些零散的警卫部队，有万把人，武器装备尚好，有一定的战斗力。不过，前几天朱培德派人将南昌的军用物资全部运走……”朱德一边说着，一边摊开地图，依次向周恩来介绍着。

“好啊！朱德同志，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你为党做了一件大事，不愧是我们的好向导、好参谋。”听着朱德的介绍，周恩来不禁称赞道。

朱德接着说道：“几个驻军团长都是死心塌地跟着朱培德的，很难争取过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一个营和几个直属连，加上公安局的一部分警察，只有几百人。”

周恩来微笑着告诉朱德，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和暂编第二十军贺龙都是日可达南昌，此外，第四军二十五师周士弟等部正在向南昌集结。起义兵力有3万多人，远远超过驻军部队，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当天晚上，在江西大旅社里，组织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书记。会上决定30日晚举行起义。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时，中央代表张国焘的到来，险些使起义计划搁浅。30日早晨，匆匆赶到南昌的张国焘，在前委紧急会议上，以种种理由阻止将要实施的起义计划。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都表示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坚持举行起义。会议争论激烈，持续几个小时仍无结果。31日，前敌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辩论，张国焘终于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朱德的任务是设法在起义前拖住驻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当天下午，朱德部署好军官教育团和公安局的起义准备工作，便来到城西大士院街口的佳宾楼。晚上，他要在这里设宴请客，主客是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团长肖曰文。朱德后来回忆这次请客的情况时说：“我被分派的任务是宴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一直搞到夜晚九点钟，还在那里吃酒饭。可是，因为发布命令太早。一下走漏了消息，那是贺龙部的一个云南籍的营长去报告的。他们得到消息立刻警惕起来，这些军官起身要走，我也不好拦阻。”

朱德送走了参加宴请的军官后，立即赶到西大街的中华圣公会，向起义总指挥贺龙报告了这一意外的情况。贺龙随即向前敌委员会报告。于是，起义提前到午夜后举行。

离开了二十军指挥部，朱德又去找他的旧属、第三军第二十一团团团长李世龙。据第三军第二十团中校团附蒋文光后来回忆说：“7月31日晚，他（即蒋文光）在街上看到叶挺、贺龙的部队情况有些不同，他赶紧跑去找第二十一团团团长李世龙，要李立刻注意，或者将部队带出南昌。可是到了那里，碰见朱德正与李世龙闲谈。朱德一见他即知来意，不等有所表示，就拉着他说：

‘文光，我们到街上走走。’没有两个小时，街上到处响起了枪声。”

尽管驻守南昌的部队进行了顽强地抵抗，却终于未能顶住起义军的猛烈攻击。至清晨6时，起义军已将城内的守军全部肃清。

曙光映照着南昌，江西大旅社楼顶旗杆上的红旗格外醒目、鲜艳，起义成功了。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30年后，朱德在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时，曾以喜悦的心情写道：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 结束语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当历史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已经聚集起一批具有丰富经验、远见卓识的杰出领袖，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121 万党员的领导群体，而且是中国亿万劳动大众的卓越代表。朱德就是这一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曾经历过艰难、曲折的历程，他们所留下的轨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各自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同样，朱德的经历也具有其独特之处。

他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时说：“我是生在封建社会的农村里，我曾看见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我曾看见过封建社会的一切腐败和黑暗，也曾看见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比封建社会更好，我曾参加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也曾经为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而努力……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他们到处碰壁，碰破了头，也找不到一条道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也曾经到处碰壁，也曾经碰破头，也曾经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经过了许多艰难困苦，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道路，只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最后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同志们！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朴实的语言蕴含着深邃的道理，充分体现出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顽强不屈的意志，以及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任何困难都没能阻止他追求真理的步伐。

的确，朱德的早年也曾像那些热望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一样，在黑暗的世界中进行着痛苦的探索。他曾为“强身救国”，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体育学堂，返乡担任体育教师，志向于推广国民尚武精神，健壮国人体魄；他曾为“建立一个民主的、独立的、统一的共和国”，投笔从戎，参加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已被卷进了军阀混战的漩涡时，终于陷入空前未有过的苦闷和怅惘。“五四”运动的大潮，使他在彷徨中看到希望之所在，感到有必要学习苏俄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于是，他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冲出封建主义的氛围。当他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遭到拒绝之后，他又摆脱了失望的困扰，远涉重洋，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并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朱德入党以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立志“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并在北伐革命兴起之初，从苏联返国，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从此，开始了他为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伟大革命实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朱德的早年经历正是在不断地追求真理的探索中度过过的。他的早年经历也反映了无数革命者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奋斗历程。正如周恩来在庆祝朱德 60 寿辰时所说的：“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朱德早期生平简表  
(1886—1927)

1886年 诞生

12月1日 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今丁家湾)的一个佃农家庭。

1888年 2岁

过继给伯父朱世连承嗣。

1892年 6岁

入药埔垭私塾，取名代珍。

1893年 7岁

转学丁家私塾。

1895年 9岁

1月25日 朱家因无力偿还地租，被迫退佃、退屋。朱德随伯父迁居大湾，辍学一年。

1896年 10岁

年初 入席家匾私塾，塾师席聘三为他取字玉阶。

1898年 12岁

戊戌变法。

听席聘三讲述维新运动的情况，开始受到革新思想的启蒙。

1900年 14岁

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同学们常在席聘三指导下，议论义和团能否打赢帝国主义列强。

英、法、德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和同学们在一起议论，感到十分悲愤。由于四川连年旱灾，亲眼看到许多饥民因“吃大户”惨遭官兵毒打、残杀，极为愤慨。

1905年 19岁

上半年 赴仪陇县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县试、府试，改名朱建

德。

到南部县观看盐井，看到盐工的悲惨生活。

下半年 清政府诏令自丙午（1806）年停止科举考试。和刘姓农家姑娘结婚。

1906年 20岁

年初 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

下半年 入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物理、化学、外文等课程。受学堂监督张澜和教师刘寿川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07年 21岁

年初 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秘密传阅《民报》，求保加入同盟会，未果。

年末 在体育学堂毕业。考试成绩多在八九十分以上。

1908年 22岁

年初 应聘赴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与当地封建保守势力作斗争。

10月 感到办教育不是一条出路，辞职返乡。

1909年 23岁

1月下旬 离乡与好友敬 跋涉千余里，赴云南昆明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历经70多天到达昆明。

夏 因四川籍贯未被录取。入步兵标，不久升任队（相当于连）部司书（即文书）。改名朱德，改籍贯为云南省蒙自县。

秋 经保荐考入陆军讲武堂，分到丙班，习步兵科。同学中有董鸿勋、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李云鹤等。教官有李根源、李鸿祥、罗佩金、唐继尧、顾品珍等。

1910年 24岁

夏 加入同盟会。

7月 因成绩优异，被选入特别班学习，学制为两年半。

1911年 25岁

春 结识蔡锷。

8月 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二营左队（相当于连），初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后任队司务长。

10月10日 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反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10月30日 云南革命党人响应武昌新军起义，在昆明举行起义（时值农历九月初九，又称“重九起义”）。11月参加援川军，不久升任上尉连长。

1912年 26岁

年初 中华民国建立。

2月 重庆、成都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5月 随援川军返回昆明。授少校衔。

秋 重返讲武堂，任军事教官兼生徒队区队长。与萧菊芳结婚。

1913年 27岁

夏 调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

1914年 28岁

年初 随步二团调防迤南地区。至1915年，渐次升任副团长、团长，授上校衔。

1915年 29岁

12月 袁世凯复辟帝制。唐继尧、蔡锷宣布护国讨袁。率部返昆明参加云南护国起义。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

1916年 30岁

1月 任步兵第十团团团长。旋即编入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任第六支队支队长（相当于团长）。

随第一军赴川。

2月 率部抵达四川纳溪。受蔡愕命，接替第三支队长董鸿勋职，加入火线。

3月 率部战斗40多天，获“英勇善战，忠贞不渝”称号。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蔡锷接受北洋军停战要求。

6月 袁世凯死。

获首先进入泸州的荣誉。

护国战争结束。

10月 驻军南溪。

1917年 31岁

3月 滇川军整编。任第七师第二十五团团团长。6月与陈玉珍结婚。

7月 护法战争起。返泸州，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

9月 滇军缩编，任第二混成团团团长。

1918年 32岁

- 1月 聘请挚友孙炳文担任旅部咨谋。3月 滇军恢复原建制，复任第十三旅旅长。被授予“勋五位”，陆军少将衔。  
率部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  
夏 率部下乡剿匪，任下川南清乡司令。  
秋 参加颐园诗社。

1919年 33岁

- 五四运动爆发。  
受孙炳文的启发，接触到各种新思潮。赞赏苏俄实行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办法。感到老的军事斗争方法不能救国。

1920年 34岁

- 夏 川滇军战事复起，成都龙泉驿一战，滇军大败。退守隆昌。  
10月 随滇军退出四川，经贵州返回云南，驻军昭通。

1921年 35岁

- 2月 逐走唐继尧，返回昆明。  
3月 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4月 兼任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等职。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是年 准备出国。

1922年 36岁

- 1月 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2月 兼任云南省禁烟局会办。  
3月 唐继尧袭击昆明。与滇军代理总司令兼代云南省省长金汉鼎逃亡四川，至5月中旬抵达四川南溪。  
6月 婉言谢绝杨森给予师长一职，乘船抵达上海。  
7月 到北京，与孙炳文会面。  
8月 返回上海，会见孙中山，执意出国，谢绝孙中山要他组织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的要求。  
拜访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遭拒绝。  
9月 与孙炳文乘法国邮轮离上海，前往法国。  
10月中旬 抵达巴黎。  
10月下旬 闻旅欧中共负责人周恩来在德国柏林，立即前往。拜访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11月 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仍是国民党员。

1923年 37岁

5月 抵德国中部城市哥廷根。是年学习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并研究军事。

1924年 38岁

3月 进入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社会学专业。

是年 负责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工作。

12月 返柏林，专门从事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

1925年 39岁

1月 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创办《明星》报。

3月 致信李季、陈启修，要求赴苏联学习，并表示回国后，终生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6月 在一次声援保加利亚、南非和中国革命运动的集会上被捕。后获释，但被吊销护照。

赴苏学习军事的要求得到中共旅莫支部的批准。

7月4日 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帮助下，乘船前往苏联。

7月下旬 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等课程。

年底 参加东方大学举办的短期军事训练班。

1926年 40岁

5月18日 离莫斯科往海参威。

6月 在海参威逗留一个多月。

7月 国民革命军正式宣师北伐。

7月12日 抵达上海。按照党的指示调查孙传芳的兵力和部署。

7月26日 奉命赴四川万县，做杨森的统战工作。

7月30日 抵达汉口，致电杨森。在汉口停一日。

8月上旬 因水灾在宜昌滞留数日。

8月11日 抵达万县。劝说杨森转向广东国民政府，加入国民革命军。

9月5日 英轮浪沉中国船只后被杨森扣留，英兵舰竟炮击万县县城，死伤群众千余人，酿成“九五惨案”，建议杨森坚决不让步。

9月中旬 赴汉口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汇报工作。

9月下旬 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杨森被委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

率20多名政治工作人员返万县。

杨森命所部东下援助吴佩孚，袭击武汉。

11月上旬 杨森所部兵败湖北。杨森向朱德表示宣布就职。

与杨 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任委员。策划军事起义事宜。

11月21日 与杨森在宜昌通电就职。

11月下旬 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

12月上旬 泸州、顺庆相继举行起义，刘伯承任总指挥。

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2月下旬 率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离万县赴武汉。

## 1927年 41岁

1月 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赴江西南昌筹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

3月 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蒋介石的爪牙杀害，引起江西各界的强烈义愤。率军官教育团游行。

4月2日 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发动下，南昌民众捣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抓获AB团头目程天放，并游街示众。

4月7日 江西省政府改组，朱培德任主席。

4月9日 经朱培德推荐，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长及市政委员会委员。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下旬 奉命率军官教育团一部赴赣东“剿匪”。

5月 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朱培德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

6月6日 朱培德下令在江西停止工农运动。

6月上旬 在临川致电省政府，辞去公安局长一职。

6月中旬 返回南昌。决定将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提前结业，一部分分到赣江流域和南浔铁路一线，做工会、农会工作，一部分回原部队。第三营继续留团学习。

离南昌赴武汉。

7月15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分共”决议案。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

7月18日 参加中共中央在武汉郊区举行的扩大会议，初步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1日 奉党中央指示，返回南昌，了解南昌敌军的兵力及部署。

7月27日 周恩来抵达南昌。向周恩来汇报南昌的情况。

前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决定于7月30日晚在南昌举行起义。

叶挺、贺龙等部抵达南昌。

7月30日 由于中央代表张国焘对起义提出异议，起义时间不得不推迟至8月1日凌晨4时。

7月31日晚，为配合起义，设宴拖住南昌守军中的两位团长。

8月1日凌晨2时左右，起义开始，至晨6时左右，南昌起义取得成功。

